

“江城书房”开进老银行

阳春三月读书天，迎来世界读书日——4月23日属于“书虫”。

前几年，汉口铜人像周围启动旧城改造，众多老房子引人牵挂，民权路花楼街拐角的“邹协盛”金号旧址尤为瞩目。最近传出好消息，“东棠书局”相中这栋西式百年建筑，江城又添一处书香绿地。

与书店结缘的不止老金号，捷足先登的早有老银行。2022年6月8日，中山大道南京路口拐角，大孚银行旧址入驻“江城书房”。若将时光闪回到2017年，“物外书店”让人记忆犹新。

大孚银行1936年建成，1938年被日军宪兵队霸占。同在南京路上的汉口商业银行1932年建成，1940年也遭汪伪市政府沾污。江城黎明之后，商业银行成为武汉图书馆，大孚银行成为武汉图书馆外借处，两座老银行共筑知识殿堂。

大孚银行呈欧式现代派建筑风格，明年即是九十老翁，返老还童为“江城书房”，往日防空袭的迷彩外墙，划过青春学子的身影。“邹协盛”由“东棠书局”接手，悬挑阳台的宝瓶栏杆藤萝缠绕，历史气息落入旋转门，悄声交织出文艺范。

“邹协盛”是武汉著名金号“邹协和”的联号之一，由江西邹氏兄弟1908年始创。江汉路一座尖塔大楼与璇宫饭店并峙，曾是极富盛名的“华康副食”，门柱上却嵌有“邹协和”“邹庆孚”旧址两个铭牌，兴隆之极可见一斑。

汉口金融业更为发达，英国麦加利、英国汇丰、美国花旗、法国东方汇理、俄国道胜、意大利华义、比利时华比、日本横滨正金等争相抢滩，中国民族资本也奋力出位，在沿江大道与中山大道之间，留下丰厚的银行建筑遗产。南京路口，大孚、大陆、金城、国货四家相望；胜利街口，商业、中孚两家接邻。江汉路无愧“金融街”，中国、中国实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聚兴诚、中南、上海、广东、台湾、盐业、四明、永利扎堆聚集。每一座老银行，都有一肚子故事，如果仅剩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空壳，恐怕只能赚一个寂寞。而中国实业银行门廊上横贯“肥肥虾庄”大招牌，总有点儿不是滋味。

大都市发展迅猛，很容易迷失自我，如何守住历史氛围又注入时代灵气，面临未来的拷问。大孚银行对角的金城银行，解放初设立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新世纪又转型为武汉美术馆，获取鲜活生命，人们更记得它。当武汉图书馆迁往新馆，少年儿童图书馆接踵而入，商业银行也得以书香绵延。如今，大孚银行/江城书店，邹协盛/东棠书局，老建筑当上“斜杠青年”，历史遗存与文化空间和谐相融。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 濛

编 辑：刘 玮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江城书房”开进老银行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鄂栋臣：极地冰原上的引路人 / 庞小平

风雨同舟

<<< <

10 在民进十年印象深刻的二三事

/ 梁守恕（口述） 袁言勇 吴 俊（整理）

九城同心

<<< <

13 保安石雕：一部匠人用双手雕刻的史诗

/ 朱春华 陈立新

委员天地

<<< <

19 以知识产权护航武汉创新发展

/ 余 浩（口述） 章旷怡（整理）

23 用爱筑伞，撑起生命的晴空 / 胡文兵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26 餐饮人的逐梦“食”光 / 朱天海

烽火江城



30 江南鏖战——“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四 / 涂文学

人物述林



38 武钢老领导沈因洛的调研风范 / 肖 萍

42 项英黄陂家世考 / 裴高才

都市寻踪



48 从“显真楼”看武汉近现代史迹 / 郭广迪

54 武昌凤凰山：凤凰来集，楚天灵瑞 / 喻 球

59 武汉航空轨迹（三） / 刘宝森

往事漫忆



63 一张欢送苏联专家的老照片 / 陈礼才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鄂栋臣：极地冰原上的引路人

◇ 庞小平

轮印：1985年4月18日，《中国首次南极测绘考察成果》获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武汉测绘学院教授鄂栋臣是第一获奖者。他自1984年参与中国首次南极考察，总共参与7次南极、4次北极考察，成为全国唯一亲历南北两极三个考察站建站和首次北冰洋考察的科学家，成为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任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地球科学组中国常任代表，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我对极地科学考察最初的印象，始于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臣教授，而他后来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导师。

1985年，是我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年，鄂栋臣教授从南极首次科考凯旋，在武汉测绘学院为学生们带来一场极地科考报告。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口打开了，让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鄂栋臣教授的风采，也让我第一次深入领略极地科学考察的魅力。那时的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却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一名极地测绘的科技工作者。

鄂栋臣教授的报告如同一颗种子，悄然埋在了我的心底，逐渐生根发芽。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充满对极地奥秘的无限向往，也让我在他的引领下，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荣耀的极地测绘之路。



鄂栋臣为南极中山站建站勘测及建立的测绘基准

真正与极地结缘，是在我毕业留校任教的第10个年头。1997年，鄂栋臣教授组织学校力量，为我国首次北极考察编制第一幅北极地区图，我有幸参与其间。正是以此为起点，我转读鄂老师的研究生，一路从硕士到博士，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研读极地知识，开展极地科学研究，并多次奔赴南北极科学考察。

2023年12月1日，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师生代表的回信。信中，习总书记高度肯定说：“近40年来，

武汉大学师生坚持参加南北极科学考察，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完成了一系列科学考察任务，传播了和平利用极地的中国主张，为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深知，今天在极地科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极地测绘事业的奠基人——鄂栋臣教授的开拓与奉献。

极地拓荒：那里是全人类最后一片净土

“极地科考，测绘先行”——鄂老师常说的这句话，不仅是他对极地测绘重要性的深刻理解，更是他一生“跨越两极，测天绘地”的信念。

1984年，鄂老师随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踏上乔治王岛，面对的是白茫茫的荒原和未知的领域。没有现成的数据，没有先进的设备，他和队友们用小平板做测图，用木桩标记控制点，硬是在狂风暴雪中测绘出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

1989年，鄂老师又参与中



鄂栋臣在南极长城站测绘



鄂栋臣建立的北极黄河站 GNSS 跟踪站

国南极中山站建站，之后几年又派出考察队员建立中山站测绘坐标系，施测中山站周围地区的大地控制点，完成整个拉斯曼丘陵地区大地测量控制网的布设与施测，并采用人工验潮的方法建立我国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高程系统。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双手冻得失去知觉时，他呵口热气继续工作；长城站主楼屋顶被狂风掀翻时，他冒着能“杀死人”的南极风，爬上 5 米高的钢梁；修筑码头时，他跳进刺骨海水与队友挽成人墙抵挡浪涛。从长城站的选址，到中山站的建立，再到北极黄河站的落成，每一次建站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汗水，每一处成就都镌刻着他的坚韧与奉献。

我曾问鄂老师：“南极那么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您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他笑了笑，平静地说：“因为那里是全人类最后一片净土。”这句话，让我第一次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做“家国情怀”。在极地，每一处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测绘标志的埋设，每一个中国南极地名的命名，都是国家权益的象征。这些地名中，既有以中

国历史文化命名的，如“长城湾”“熊猫岭”“炎黄雪坡”；也有以科学考察区域地理特征命名的，如“冰穹 A”。每一个地名，都凝聚着鄂老师对极地科学的热爱，也承载着中国极地科考的历史与文化。

鄂老师用双脚丈量冰雪，用双手绘制地图，让五星红旗在地球最南端高高飘扬。他的身影，是极地风雪中最坚定的坐标。

鄂老师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的执着、教育家的奉献和爱国者的担当。他的故事，不仅是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缩影，更是激励后来者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正如他所说，极地是全人类最后一片净土，而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守护这片净土，是每一位极地科考者的使命与荣耀。



鄂栋臣在北极点上

严师慈父：冰裂隙不会因为你的粗心而消失

鄂栋臣教授担任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极地测绘科学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是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培养了大批极地测绘创新人才，如今活跃在极地科考、科研和教育的第一线。

1994年，武汉大学开始遴选优秀大学生参加极地科学考察，形成了“爱国爱校、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求是拓新”的极地科考团队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生动践行。“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已成为广大师生的共同信念。

鄂栋臣教授倡导“到极地去，把南北极作为育人新场所”。学生们在极地亲手升起国旗和队旗，开展测绘科考任务，随“雪龙号”进行大洋考察，监测极地环境。极地课堂实现了考察—学习—研究一体化，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综合素质强的创新人才，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优异成绩。

由武大师生历时40余年积淀的极地科考文化，既体现了科学精神，又彰显了人文情怀，成为独具武汉大学特色的校园文化之一，助力一届又一届学子成长成才。极地科考文化，是新时期武汉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师生、校友和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价值。

作为鄂老师的学生，我既敬畏他的严格，又感念他的关怀。

1997年，我刚进入课题组时，

对极地测绘几乎一无所知。鄂老师并不急于让我投入研究，而是拿出一摞泛黄的考察日记，语重心长地说：“先看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在那些日记里，记录着南极的风雪、队友的协作、失败的沮丧和成功的喜悦。透过文字，我仿佛亲历了那段艰苦奋战的岁月，感受到极地科考背后的艰辛与荣耀。

鄂老师对学术的要求近乎苛刻。我的学位论文被他修改得满篇红字，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严肃地说：“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南极的冰裂隙不会因为你的粗心而消失。”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头，成为我学术路上的座右铭。然而，当我因实验失败而沮丧时，他又会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鼓励道：“科研就是不断试错，怕什么？南极的暴风雪我们都扛过来了。”他的严厉与关怀，如同一盏明灯，指引我在科研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001年，我有幸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考察。出发前，鄂老师特意来送行，塞给我一包武汉的热干面，笑着说：“南极的伙食单调，想家了就尝尝。”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叱咤极地的著名科学家，而只是一位牵



中国第二十七次南极科考队成功归来

挂学生的慈祥师长。那包热干面，不仅承载着家乡的味道，更寄托着鄂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期望。

鄂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做科研，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他的精神，如同极地的冰雪，纯净而永恒。

薪火相传：极地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

鄂老师是一位深具家国情怀的爱国者。他出身贫寒，历经坎坷，却始终心怀对祖国的赤诚。他曾深情地说道：“那些苦难的日子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正是这份对祖国的热爱，驱使他投身极地科学事业，一生 11 次参与跨地球南北两极的科学考察。他自豪地讲到：“在极地，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测绘标志埋设在哪里，象征着中国的极地权益就延伸到哪里。”这份自豪，不仅是对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国家尊严的捍卫。

鄂老师不仅是极地科学的探索者，更

是极地知识的传播者。他以 11 次南北两极科考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的极地知识为载体，为极地科普宣传、科普创作、科普基地建设等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中国科普作协评为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被湖北省科协评为“省科普先进工作者”。他在全国各地大学和中小学做了 600 多场南北极科普报告，用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经历，教育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科学。他的每一场报告，都是一次心灵的启迪，点燃了无数年轻人对极地科学的向往。

作为科学家，鄂老师是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开创者、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的奠基人。他创建了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创造性探索出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搭建了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中国极地考察支撑条件建设单位、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等多个创新平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极地测绘人才。

鄂老师利用经典大地测量方法，首次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大地测量基准，是

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

“长城站地形图”的测绘者；他还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南北极地图集》，为极地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他常说：

“极地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需要你们接续奋斗。”在他的影响下，武汉大学参与了历次南极科学考察，已成为中国极地科考的中坚力量，累计派出师生 200 多人次奔赴南北极。



鄂栋臣和历次科考队员在武汉大学南极石前合影

即使退休后，鄂老师依然心系极地。70多岁时，他还亲自策划科研选题，关心青年学者成长，带领学生参加国际会议。2014年，他被确诊肺癌，术后身体虚弱，却仍坚持整理书稿、指导学生。2018年，我们终于将他的毕生心血《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极地征途——中国南极科考日记档案》两本书送到他手中。他摩挲着封面，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自己毕生奋斗的结晶。

2019年2月21日，鄂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天，武汉下着小雨，仿佛天空也在为他落泪。我站在他的遗像前，回想起他常说的：“去南极，就是讲奉献，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极地科考的精神，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对极地科考的执着追求，也成为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每当我凝视着南北极地图上那片广袤的冰原，看着现代化的测绘仪器设备传回的数据，鄂老师当年扛着仪器在暴风雪中跋涉的瘦小身影，总是历历在目。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但极地科考的精神从未改变——那是敢于探索、勇于奉献的赤子之心，那是鄂老师用一生诠释的信念与追求。

鄂老师走了，但他绘制的南极地图仍在，他命名的“长城湾”“熊猫岭”等地名仍在，他培养的学生仍在，他学生的学生仍在。我们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在极地测绘的道路上前行。因为我们知道，在冰雪覆盖的远方，有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们，那是恩师殷切的期望，那是他对极地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

作为中国极地测绘的先驱，鄂栋臣教授以其卓越的学术远见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鄂栋臣在办公室

为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一生，不仅用卓越的成就书写了极地测绘的辉煌篇章，更用精神的力量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伟大——那是一种对科学真理的无限追求，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以及对国家使命的坚定担当。

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鄂老师，愿您在天堂安息。极地的风雪里，永远有您的传奇；我们的心中，永远有您的身影。您用一生书写的极地故事，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行，在冰雪的世界里，追寻科学的真理，守护祖国的尊严。

（部分内容取材于鄂栋臣教授弟子们的口述）

庞小平，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极地环境监测与公共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在民进十年印象深刻的二三事

◇ 梁守恕（口述） 袁言勇 吴 俊（整理）

人物名片：梁守恕，第八、九届民进武汉市委主委，第九、十届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我是从1997年到2006年，将近10年的时间担任民进武汉市委主委。这十年，是武汉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统战工作非常活跃的十年。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下，武汉民进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全会上下团结一致，凝心聚力，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情字一线牵，上下一条心

担任主委十年，我印象最深、感触最深的，就是武汉民进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情字一线牵”。

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呢？因为民进是一个参政党，组织构架比较松散，会员都有本职工作。因忙于本职工作，在遵守会内纪律方面就不那么严格。有些重大活动通知会员们参加，都感觉到十分困难。但对民进有感情的会员，工作非常积极。所以我们感觉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党派特征，以感情来联络会员，通过情感把心聚到一起。

民进市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必须加强对基层和会员的服务，通过服务来加深会员对民进的感情。为了贯彻落实好这一精神，机关开展了服务功能大讨论活动，旨在提高机关为基层服务、为会员服务的认识和水平。这个大讨论活动每周举行一次，机关每名工作人员，包括司机，都要上讲台宣讲如何为基层、为会员服务，掀起了一股热潮。



接受民进成立60周年采访

同时，我们还提出机关成员要与会员交朋友，使得基层和会员真正感受到机关就是会员的家。这其中做得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宣传部长胡蓉，一个是当时的社会服务部长鲍胜恒。他们结合本职工作，深入基层，与广大的会员交朋友，并且交的朋友非常多。这样一个交朋友的举措和活动，形成了一支民进的骨干队伍。

机关真诚地服务基层、服务会员，把会员真正团结在了一起。会员的个人问题，比如职称、住房或其他问题，都愿意到民进机关寻求帮助和解决，亲近了机关和会员的关系，做到凝心聚力。有个叫朱法海的老会员，有困难就愿意找民进机关，机关也确实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这位同志退休以后还在发挥余热，一直到很高的年龄都还在奔走于基层，跟会员联络。

会员是党派的主体，只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上下才能一心，参政党才有活力。当时出现了一个现象：会员有事情，都愿意到机关来认真地交谈，甚至有些会员是办事路过，也想到机关来坐一坐，向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探望自己的朋友。“情字一线牵”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任主委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

双月座谈会，发言见能力

我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双月座谈会”。这是武汉民进履行参政议政职能高规格的会议之一。当时“双月座谈会”多半以主委发言为主，有些课题也请相关副主委发言。

那时调研室是不给写发言材料的，都是担任发言人的主委或副主委自己准备，有很多是现场即兴发言。这对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政策水平，以及对基层情况的了解，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发言涌现了很多个性化的东西，如饱满的情绪和生动的语言。

我任主委十年，一共接触了四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分别是钱运录、罗清泉、陈训秋、苗圩。这四位领导当时对统战工作都非常重视，只要有空，都亲自参加“双月座谈会”，跟各民主党派的主委们面对面交流，气氛亲切、融洽，每场会都开得活力满满。

这里面记忆最深的是在讨论武汉市“十五”规划的时候，代表武汉民进发言的是李家声副主委。他提出了34条意见和建



1997年11月，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合影



2002年4月，梁守恕在市双月座谈会上就建设绿色武汉问题发言

议，罗清泉书记当时很受触动，高度赞扬了李家声。罗书记在总结讲话中说：“武汉市‘十五’规划经过了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又经过了几十次座谈会的研究和征求意见，现在‘双月座谈会’上听到民主党派的意见，特别是李家声同志能够提出34条建议，可见我们民主党派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这个规划的深入研究。”

每次参加“双月座谈会”，我都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抱着一种重大的使命感、责任感。一方面，我们要把民进对武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诉求反映上去，呈递给市委，同时要把市委的声音传达给所有的民进会员。这是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另一印记。

办“求实学校”，促教育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职业培训事业还相对落后，民办教育还没有放开。民主党派有知识分子荟萃的优势，当时武汉市民主党派就兴起了一个创办“求实学校”的办学活动。

民进是一个由许多文化教育界别人士组成的参政党，党派中央对文化教育服务社会的要求也很高。开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活

动，就必须有相应的机构。所以我们就创办了武汉市民进求实培训学校。

当时民主党派办学是非常艰难的，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专职的人员，我们就吸纳会内热爱教育、懂得教育，且愿意为教育奉献的会员来兴办学校。市民进求实培训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杨云起同志，后来他年事渐高，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物色到钮心莉会员。

钮心莉非常热心，对民进感情很深。她既有奉献精神，又有文化教育方面的功底，组织沟通等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动员她接任了校长。后来经过实践的考验，她确实能力很强，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接任校长后，钮心莉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兴办过程中，学校遇到过很多困难。缺少资金，她就想尽各种办法。21世纪初的时候，她在三阳路租了一栋大楼作为办学基地，一年的租金是二三十万。当时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都是她自己筹集的，到处举债。结果租下这个地方办起学校之后，却长时间招不到学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咬牙坚持下来，并让学校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所有民主党派都办了学，经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唯独还在的仅武汉民进这一家。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民进求实学校能够生存下来，钮心莉同志功不可没。学校现在的发展依然很困难，虽然打了民进的牌子，但民进其实没有给资金。因此也希望我们全市的会员，特别是民进的领导，要多关心支持求实学校，让学校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实，更加健康。

袁言勇，民进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工委主委、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吴俊，市民进机关干部

保安石雕：一部匠人用双手雕刻的史诗

◇ 朱春华 陈立新

湖北大冶保安镇的青石，自唐代便与匠人的锤鏊相遇。彼时，先民们在农闲时开山取石，以锤鏊为笔，以青石为纸，雕琢出石碾、石磨等生活器物，开启了这门技艺的千年之旅。

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保安石雕依然熠熠生辉。2008年，保安石雕被国务院列入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保安镇再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千年技艺的薪火，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石中岁月：从生活器物到艺术丰碑

据《尹氏宗谱》记载，唐末时期，尹解元村的祖先从甘肃天水迁徙至江西瑞昌，

后又辗转来到保安凤凰山落业。第一代落业的“太公”国南公的长孙在乡试中高中解元，从此，“尹解元”这个名字便在周围村落传开，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第一代国南公在此落业以来，后辈们便在种田打渔之余，开山取石，依石而雕。他们用锤子、鏊子、钁子等传统工具，将山中的乱石打磨成各种实用之物，如石碾、石磨、碓臼、石辕额等生产类石雕；石桌、石凳、石柜、石椅、石笔筒等生活类石雕……

尹解元村的凤凰山和牛山，均为石灰岩结构，青石蕴藏量大，质地优良，易于雕刻，为石雕艺术提供了极佳的材料。坐落于保安镇西北部保安湖畔的尹解元村，距离镇区约10公里。在1926年樊口堤未筑、民信闸未建之前，保安湖的湖水一直延伸到尹解



东湖寓言石雕《猎人争雁》《狐假虎威》

元村旁，使得凤凰山脚下和大门口都能停靠船舶。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and 地理条件，尹解元村的村民靠山取石、依水行船，干起了石头加工业。石雕技艺代代相传，石雕作品也得以销往各地，名扬四海。

新中国成立后，保安石雕的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不仅有亭台楼阁、飞禽走兽，还有以神话故事、寓言故事、古今人物、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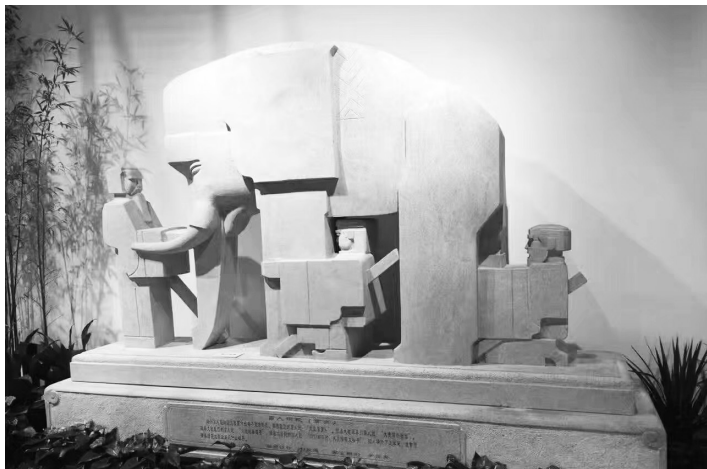
1980年后，保安镇石雕艺术逐渐走向市场，石雕的材料、设计和制作都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前提。材料从青石扩展到大理石、花岗岩、辉绿岩，甚至从国外进口，设计题材也更加多样化。

特别是大型城市雕塑引人注目。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寓言组雕，黄鹤楼的四大石雕牌楼、《九龙闹海》碑、《崔颢诗图》碑，磨山公园的古肆牌楼和红墙画，晴川阁禹王庙及归元寺的镂空石头宫灯等，都是保安石雕艺人的精品力作。

其中，武汉东湖的寓言组雕是保安石雕技艺长河中的里程碑。这是由湖北美术学院刘政德教授设计，保安尹解元古建队雕刻的城市公园组雕塑。1985年完成的第一期工程，

包括《曾子不说谎》《盲人摸象》《猎人争雁》《射手与卖油郎》；1986年完成的第二期工程，有《狐假虎威》《三个和尚没水吃》《滥竽充数》《叶公好龙》。这些作品均以中国古代寓言为蓝本，采用积木式几何造型构成，富有立体感，且构思奇巧，寓理于乐。

《猎人争雁》以一只仰头朝天的猎犬暗示大雁早已飞离，两位猎人以手相连，相互推挡，呈H形，争执仿佛在不断激化，H形的造型也使得作品更具立体感，给人敦厚、结实的感觉。《狐假虎威》则创造性地把狐狸放置在老虎背上，运用两个L形的主体造型，通过线条的变化和穿插，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



东湖寓言雕像《盲人摸象》

组雕竣工后，广受社会好评，其中《盲人摸象》《猎人争雁》《曾子不说谎》《卖油郎与神箭手》获得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最佳奖，并被纳入美术教材，成为学生课本的示范作品。

1986年，保安选送的石狮参加湖北省民间美术展，并被湖北省选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首届艺术节，荣获民间工艺二等奖。1996年，文化部专家到保安实地考察，对石雕技艺给予了很高评价，保安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石雕）艺术之乡”，那是保安石雕的荣耀时刻。

鏊尖上的变奏：传统与科技共舞

保安石雕的魅力，源于匠人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在传统工艺流程中，从选料到抛光，需经历数十道工序。匠人需依据石料的纹理、硬度与色泽，确定雕刻题材与手法。一锤一鏊间，粗粝的青石渐次显露出狮子的威猛、观音的慈悲，抑或田园的静谧。

早期的石雕完全依赖手工工具：圆鏊雕轮廓，扁鏊刻细节，铁锤击打力道全凭经验。20世纪80年代，电动工具的引入带来了革新。粗磨机、点线仪提高了效率，但匠人们仍坚持手工完成关键步骤。2000年后，电脑设计与自动雕刻技术进一步普及，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让保安石雕既能批量生产，又不失艺术灵魂。

保安石雕的艺术风格也随时代而变化。1980年前，作品以实用为主，风格质朴写实；80年代后，装饰性与艺术性增强，神话故事、城市雕塑成为新题材；2000年以来，匠人更注重神韵表达，融合中西元素。尹国安雕刻的“西洋狮”，既有东方线条的流畅，又具西方雕塑的立体感，成为文化交流的艺

术典范。

在漫长的技艺长河中，保安石雕逐渐形成四大鲜明特征。

首先，石雕构思新颖独特，不拘一格。过去，匠人多是祖传手艺，雕刻前不依赖样稿，只凭心中的腹稿。他们根据石材的大小、形状，自由发挥，雕刻出各式各样的石雕作品。这种自由的创作方式，让每一件作品都带有创作者的个性印记，如同指纹般独一无二。

其次，刻工细腻，生动传神。清代的浮雕《渔樵耕读》碑，便是这一特点的绝佳体现。画面中，庭院、农田、小桥流水、渔船沙洲等元素巧妙组合，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田园画卷。各种图案雕刻得栩栩如生，刻工精细入微，连渔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仿佛让人置身于真实的渔樵耕读生活之中。

再次，手法多样，融会贯通。匠人能够根据作品的内容和意境，灵活选择不同的材料，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在武汉东湖寓言公园的人像雕刻中，他们注重结构的准确性，线条流畅，人物表情栩栩如生。该细腻的地方精细入微，该粗犷的地方则大气磅礴，将人物的神韵和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而在武汉磨山公园的人像雕刻中，匠人则采用了方圆结合之术，使作品在方圆之间展现出独特的美感。远看时，作品气势磅礴，令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近观时，又细腻生动，仿佛人物从石头中走出来，活灵活现地站在眼前。

最后，想象丰富，造型夸张。保安石雕匠人注重想象，善于抓住事物的个性特征，通过夸张等手法，突出事物的本质，丰富作品的艺术语言。

保安匠人以新颖的构思、细腻的刻工、多样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

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石雕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的结晶，更是匠人智慧和情感的凝聚。

匠脉薪传：石头里走出的技艺大师

文化认同与宗族传承，是保安石雕延续千年的根基。尹氏一族以技艺为荣，技艺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成为家族荣誉的象征。这种以乡情和血脉为纽带的传承方式，让保安石雕在动荡岁月中始终未断薪火。新中国成立后，保安走出一大批杰出的石雕匠人，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在石雕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传承和发扬石雕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尹国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大冶保安镇尹解元村的第11代石匠，尹国安自幼便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6月，高中毕业的尹国安正式踏上了石雕之路，他来到武汉的一家石雕公司，开始系统地学习和实践石雕技艺。尹国安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经常深入大自然，观察老虎、熊猫、骆驼等动物，以及山上的树木花草和各种鸟

类。这些观察为他的石雕作品注入了生动的灵魂。

1999年11月初，尹国安带着相机，踏上前往杭州、陕西等石雕之乡的旅程，他在那里寻访名胜古迹和仿古建筑，汲取灵感。在杭州西子湖畔，尹国安遇到了德诚石业的石姓老总。石总被他的才华所吸引，邀请他雕刻一件“醒狮望月”。尹国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仅用3天时间，便完成了一尊栩栩如生的作品。这不仅展示了尹国安高超的技艺，也赢得同行的赞誉。

2011年6月初，德诚石业承接杭州市萧山区萧南路的“育才桥”景观大桥工程。这座桥长85米、宽20米，共设5拱，桥身、桥肩、栏杆全部采用石雕工艺。为了使桥梁与城市建筑风格相协调，尹国安深入研究了杭州的建筑、公园庙寺、湖畔桥梁和道路古建。经过3个月的努力，这座仿古大桥在尹国安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荣获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优秀参展项目。

尹国安的才华不仅体现在桥梁石雕上，他还参与了杭州西子湖畔雷峰塔的修复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塔上的汉白玉石雕围栏、栏杆和地下踏步都出现了老化和风化的问题。浙江省博物馆经过考察，决定更换这些石雕部件。尹国安受邀参与这一项目，他仔细观察原有栏杆和踏步的图纹，精心构思了雕刻复制的方案。

他与石匠们一起，日复一日地在汉白玉石上凿龙雕凤、刻草鏤花、描纹凿凸。最终，他们成功完成了150个栏杆和150块碑石的仿造雕刻，并顺利安装完毕。

如今，尹国安自主经营的杭州雄风石雕厂和杭州杭泰石材装



尹国安

饰有限公司，拥有近百名石雕艺人，年产值达到1850万元。他的石雕业务已经扩展到安徽、上海、北京等10多个省市，甚至远销日本、韩国等国家。

就在此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全国共有942人入选，其中湖北省有39人，尹国安榜上有名。

另一位尹晴岚，则是保安石雕技艺在当代商业语境下的破局者。这位生于青石巷、长在雕琢声中的守艺人，血脉里流淌着祖辈相传的凿刻韵律。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尹晴岚不仅在工商管理学院汲取知识养分，还利用周末和节假日，频繁往返于村里石匠们的古建筑工程工地，研究石雕画图艺术，动手打鑿石雕作品。

毕业后，尹晴岚毅然放弃在武汉的就业机会，回到爷爷的古建公司。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工匠师傅们用手工砂轮机打磨石雕工艺品的独特技艺，大为振奋。尹晴岚迅速购进相关设备，结合祖传手艺，丰富自己的石雕技艺。随着石雕技艺日益精湛，他不仅能承接设计城市景区和公园石雕群的工程，还成为公司的领军级匠人。

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2008年，尹晴岚听闻无锡石雕工艺墓碑生意红火，便前往考察。无锡的市场让他看到了商机，随后他筹措资金，买下小型石雕厂，招收学徒，开始了独立创业之路。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团队的努力，他们的石雕工艺墓碑生意逐渐兴隆，产品不仅受到国内客户的喜爱，还远销海外。

其后，他又果断回武汉发展，租场地，招徒弟，加工石雕工艺墓碑。二叔和村子里的石匠们纷纷加入，共同创业。随着生意的发展，他们实施量化生产和批发销售，将市

场从武汉辐射到整个湖北，甚至推向全国。当得知汉西路市场要搬迁重建的消息后，尹晴岚迅速抓住机遇，将石雕工艺厂的设备搬进新址，开始打造石拱桥，加工大型石雕工艺工程。

2014年，尹晴岚应家乡政府部门的邀请，回到保安镇创办石雕工艺产品企业，安排当地村民就业，开展石雕技能培训。他将传统石雕艺术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打造石雕艺术文化产业园和文化镇域，为石雕艺人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

为适应市场发展，他将企业延伸至麻城市，创办分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规模。此外还借助网络平台宣传公司产品，率先成立石雕电子商务公司，实现网上交易。如今，湖北广顺石雕工艺有限公司生产的石雕工艺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青石新生：从乡土作坊到文化名片

解放前，石雕艺人多是农忙时扛起锄头耕作，农闲时拿起刻刀雕琢，那一件件门闸、墓碑，是他们对生活的质朴回应。

1976年，仿佛一阵春风吹过，尹维舫在尹解元村点燃了石雕产业的星星之火，办起第一个石雕加工厂，又扩展为石头锯坊，让保安石雕开始在中市场中崭露头角。1980年后，保安石雕艺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出家门，奔赴全国各地，用双手雕琢出生活的希望。

1984年，尹解元组建大冶县保安石雕工艺基建队，让保安石雕艺术逐渐形成产业规模。2000年，尹维舫在武汉成立龙飞石业责任公司，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在他的带动下，保安镇的石雕艺

人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开办公司，武汉的龙飞石业、凌云石材，杭州的杭泰石材装饰等公司，如同繁星点缀夜空，让保安石雕的光芒照亮了全国。

保安市在促进石雕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石雕的宣传和传承。1987年5月，湖北电视台、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群众艺术馆联合在尹解元村拍摄石雕专题片，并在同年9月的全国首届文化艺术节上推介，让保安石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国内各新闻媒体对尹解元石雕进行了大量报道，保安石雕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1996年，文化部专家到保安实地考察，对保安石雕技艺给予了很高评价，保安市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石雕)艺术之乡”。此后，大冶市政府和保安市政府先后采取多项措施对保安石雕传统技艺进行抢救性保护，出版保安石雕书籍，拍摄、制作石雕专题片，申报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保安石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06年，保安石雕被纳入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8年，保安石雕被国务院列入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保安石雕艺人尹国安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冶尹解元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保安石雕的传承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2010年，保安市选送9件石雕作品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获得两金、三银、四铜的好成绩，这是保安石雕艺人多年来不懈努力与追求的见证。2013年，保安石雕在湖北省“一县一品”评比中被省政府确定为大冶市文化品牌，成为保安市乃至大冶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保安市尹解元村门楼

2014年，保安实施“石雕产业振兴计划”，把石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石雕产业与生态旅游相融合，积极打造石雕商贸街、石雕主题公园、石雕产业园，让石雕产业成为镇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2022年3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大冶市委宣传部携手，共同主办“云上石刻艺术之乡”和“湖北省石雕艺术遗产基地”授牌仪式。会上，大冶市副市长乐晗提出，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将石雕艺术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探索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保安石雕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大步迈进。

朱春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石匠》；陈立新，大冶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大冶市作家协会会员

以知识产权护航武汉创新发展

◇ 余 浩（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余浩，市政协委员，武汉智权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创始人；湖北省专利代理行业协会副会长，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秘书长。

二十年前，当“知识产权”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还只是陌生概念时，我带着对规则的敬畏与创新的热忱，扎进这片荒芜之地。从北京一间狭小的办公室起步，到创立湖北本土的大型知识产权公司；从为国企撰写第一份专利文件，到用 AI 技术重塑行业标准；从埋头商业服务的创业者，到为中小企业维权疾呼的政协委员——我的二十年深耕之路，是中国知识产权行业从启蒙到勃兴的缩影，也是一位企业家将专业价值与社会责任深度融合的实践之路。

在“蓝海”中锚定方向

2003 年，我在校就读法律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职业轨迹——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法律专业业务员，知识产权代理方向。尽管当时的自己对专利代理不甚了解，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加入了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从此与这个行业结缘。

在北京工作时，每天接触的客户大多是跨国企业，他们早已将专利视为商业竞争的核心武器。而国内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仍停留在可有可无的阶段，认为专利不过是几张纸，更愿意将资源投入短期见效的领域。



评为湖北省专利代理AAAAA级机构

当时我读到《蓝海战略》一书，深受启发。从商业上来看，知识产权这类服务机构在国内尚属稀缺资源，这不正是一种“蓝海”的状态？我敏锐捕捉到这一领域的巨大潜力，决心深耕其中。

2006年，我回到家乡武汉，创立了智权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选择武汉，既因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也因湖北作为科教大省，高校林立、科研资源丰富，却鲜有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我心中暗想，若能扎根于此，或许能为本土企业筑起一道“护城河”。

当时我们团队仅有4人，挤在硚口富商大厦不到30平米的办公室，以“中国智造、权行世界”为初心，开启了一段创业征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成立初期，智权曾代理一起跨国商标维权案。我们服务的武汉某餐饮企业，准备进军土耳其市场，突然发现其商标已被当地原代理商抢先注册。该代理商在合作期间利用信息差，恶意抢注商标后反向要挟企业高价回购。我们立即启动跨国诉讼程序，这场涉及知识产权规则博弈的维权战持续了整整三年。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信息壁垒与隐性不公——海外代理商熟谙当地法律漏洞，而中国企业因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认知不足陷入被动。三载诉讼历程让我们对欧盟及中东地区商标法规有了深刻理解，从取证规则到诉讼程序，从异议期限到举证标准，每一步都在破除认知盲区。

这场代价高昂的维权最终以和解告终，但留给中国企业的不仅是市场准入权，更是刻骨铭心的警示：全球化竞争中，对国际规则的系统性认知与前瞻性布局，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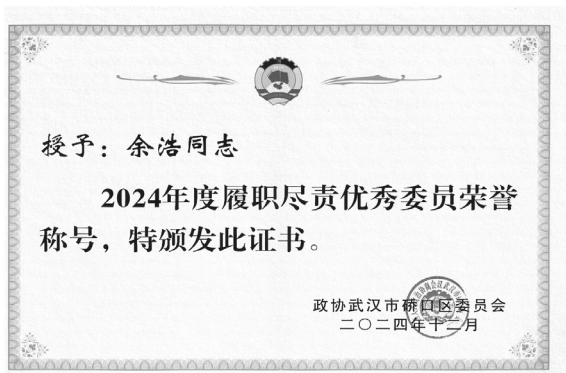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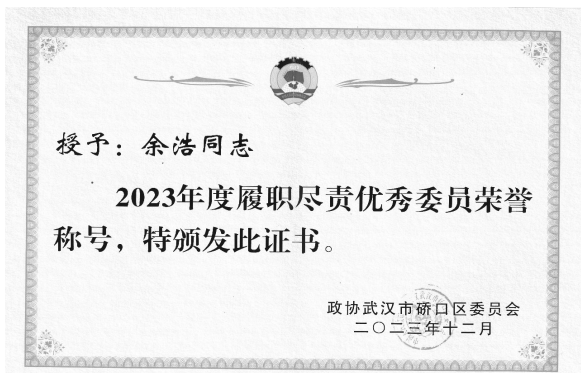
回望创业初心，支撑我的不仅是商业嗅觉，更是一份推动“中国智造”走向世界、助力武汉本土企业赢得国际市场竞争的使命感。

在变革中寻找新坐标

武汉国有企业众多，但彼时，许多国企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停留在“荣誉墙上的证书”，并不重视。面对冷遇，我带着团队反复调研，发现国企并非不需要专利，而是缺乏系统化管理能力。许多国企专利申请后便束之高阁，年费漏交、技术泄露等问题频发。我们决定聚焦国企需求，提出全生命周期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从技术挖掘、专利申请、年费管理到侵权应对，提供一站式服务。

我们创业取得进展，主要得益于抓住了武汉地区通信和新能源两个领域的发展机遇。在中国通信行业最初发展起步时，武汉依托本地邮科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通信技术上的积累，我们得以在区域市场获得发展基础。

后来新能源产业快速兴起，恰逢武汉



连续两年获评优秀履职委员

东风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集中突破，专利成果大量涌现，我们又及时把握住这轮产业转型的机会。通过先后承接通信技术成熟期与新能源爆发期的双重红利，结合武汉本地特有的邮科院技术资源和东风产业生态，公司最终实现了阶段性的发展成果，在武汉站稳了脚跟。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许多企业和单位开始注重专利布局。截至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连续七年全球第一，但“大而不强”的问题逐渐显现。许多企业追求专利数量，却忽视质量。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也陷入低价竞争，服务同质化严重，阻碍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转机出现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战后，贸易战的“倒逼”让很多企业意识到核心技术买不来，只能依靠自己创造，之后全民都进入知识产权保护的状态。

我们公司的业务量在其后三年翻了两倍，年营收突破4500万元，还在襄阳，武汉东湖开发区、经开区设立分所。智权成为湖北本土事务所中第一个完成集团化运作的事务所，连续两次获评为省AAAAA级专利代理机构，同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信用等级A+级机构。

这些年，我们的业务不断向外拓展，

积极走出舒适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2023年，我们竞标重庆长安汽车全球专利布局项目，竞争对手包括北京、上海及重庆本地的头部机构，最后倚仗在相关领域的专业度，一举中标。

面对AI技术的冲击，我们选择主动拥抱变革。早在2024年，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有AI模型，将数十年积累的专利数据导入算法，提升检索与分析效率，我坚信AI是工具，而非对手。如今，我们的AI系统已能精准识别技术方案的创新点，代理师得以将精力聚焦于高价值的战略布局。

未来，要在变革中锚定新坐标。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冲击，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我的思考愈发清晰：专业化是根基，国际化是方向，数字化是工具。智权也将继续提升服务质量，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帮助更多的企业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助力经济创新发展。

从行业到社会的担当

2017年，我当选硚口区政协委员，2022年成为武汉市政协委员。身份转变让

我思考：知识产权不应只是商业工具，更应成为社会创新的基石。

这些年，中国知识产权行业已进入从“大”到“强”的关键转型期，政策支持、法律完善和技术创新为行业发展注入动力，但需解决质量提升、转化效率和国际化竞争等深层次问题。未来，知识产权将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要素。

为此，我积极参与全国行业标准制定，如《商标人才库商标代理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专利技术实验验证指南》；并担任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创新与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专利代理行业协会副会长、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秘书长等职务，努力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针对武汉知识产权服务短板，我在2022年提出《关于加快培养和引进顶尖知识产权人才，做强做大本土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的建议》。尽管“十三五”期间武汉吸引了一线城市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但“水土不服”问题突出，许多机构难以深入服务本地创新主体。为此建议：制定专项政策吸引顶尖院校专业人才和湖北籍从业者回流；鼓励专利代理师向经营者转型；打通资深代理师与高级职称评审通道；重点扶持2-3家本土专利代理企业，支撑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针对武汉地区低价中标乱象导致专利质量空心化，威胁创新成果保护的情况，我进一步提出《关于加强市场监管模式下的专利代理业招标管理，高质量保护我市创新产业集群成果的建议》，建议建立全市招标统



参加 2025 年武汉市两会

筹机制，强化市场监管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动培训；严打无资质代理和恶意低价竞争，在高新技术企业评定中实施专利代理合规性审查及“一票否决”制度，筑牢创新保护屏障。

2024年的某个冬日，亲历的一件事促使我将参政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在2025年武汉市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规范教育惩戒权，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体系的建议》提案，建议明确“惩戒≠体罚”，建立教师、家长、社工联动的心理干预机制，共同守护下一代的成长。

回望二十年，从30平米的办公室到湖北大型知识产权及科技竞争法律服务提供商，从专利代理师到政协委员，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用专业守护创新的初心。面对AI的冲击，我坚信机器能替代流程，却替代不了人的判断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专业化+数字化”，让每一份创新都能在规则与守护中生根发芽。

用爱筑伞，撑起生命的晴空

◇ 胡文兵

人物名片：胡文兵，江岸区政协委员，湖北省肢残人协会主席，武汉标杆通用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作为一名残疾人，也作为一名党员，在我最困难和绝望之际，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照，重获新生。从最开始需要四个人照顾，到现在可以独立生活；还考取 C5 驾照，能开车出行。家人和社会为我撑起了一片生命的晴空，我也将这份温暖与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创办皓然公益服务中心

2015 年的一个冬夜，一场车祸让我的人生骤然“停摆”。脊髓损伤、高位截瘫的

诊断书，像一记重锤击碎曾经的骄傲——我再也无法站立，甚至无法独立完成最简单的日常动作。从年薪百万的建筑企业高管，到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巨大的落差几乎将我击垮。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参加了武汉市残联为脊髓损伤患者打造的生活重建训练营。在那里，我遇到许多同样遭遇的导师和学员们，他们中有人双手无法动弹却能独立生活，有人下肢瘫痪也能开车出行。我逐渐从心底正视并接纳了自己的“新身体”，明白了身体的残缺不是终点，精神的丰盈足以支撑生命的厚度。

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开始关注脊髓损伤这个群体。目前我国有脊髓损伤者达 130 万人，每年还在以 5-6 万的速度增长，

年龄主要集中在20—30岁，受伤原因主要是交通事故、极限运动、职业伤害和病变。经过调研后我发现，许多后天致残者因缺乏康复知识，长期卧床导致并发症频发，甚至丧失生活信心。

2016年，我自筹资金，聚拢几位残疾人朋友，创办了武汉市皓然残障人士公益服务中心，想把亲身体会到的助残项目传递下去，协助重度肢体残障人士重建生活，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与帮扶。

创业初期，尽管出行不便，我依旧搭乘飞机前往中国台湾、重庆等地，考察学习生活重建训练项目。为摸清市场情况，在各类人群中寻求建议，深入到残障人群中了解他们的需求。为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无论每天多晚回家，我都会坚持研读公益服务类书籍。

当年10月，我们开始承办“生活重建训练营”活动，通过对有着同样遭遇的人群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希望。学员小莉因脊髓损伤下肢瘫痪，生活起居完全需要母亲照顾。参加皓然公益的训练营后，小莉摆脱了消极情绪，尝试重新融入社会。如今，她可以独立开车出行，和父母一起喝下午茶、旅游，还成为艺术团的签约演员。更令人欣慰的是，她成了皓然公益训练营的见习教练，从学员变成老师，试图去帮助更多人。

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投下一枚石子，爱心的涟漪逐渐荡漾。在皓然公益中心，像小莉这样从昔日学员转身成为教练的，已有二十余人，点点微光汇聚成星火。

用“无障碍”去传递爱

无障碍环境不等同于简单的助残设施，它是推婴儿车的家长、拄拐杖的老人、拎重

物的上班族共同的出行需求。受伤前，我参与过一些相关工程设计和楼宇改造的项目；受伤后，我更深知无障碍环境的重要性。

2017年，我成立武汉标杆通用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辅具生产和无障碍改造。公司利润全部用于补贴皓然公益服务中心的运营，形成了内部“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

我们致力于研发和推广无障碍产品，为残障人士提供便捷、安全的出行和生活环境。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向残联提交无障碍改造申请，免费享受我们团队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我们认真做好每一个项目，即便许多项目没有直接收益，仍坚持承接。靠着一个好口碑，逐渐扩大了市场。

2019年，武汉军运会赛事场馆构建无障碍环境，我参与了其中的调研。体验后发现，场馆的洗浴室没有配备无障碍设施，残疾运动员训练后很难独立完成洗浴。后来设计人员对洗浴室进行了优化和改造，使用效果很好。

随后，我多次受邀参与国内外重大无障碍建设研讨论坛，参与武汉市2020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评审发布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课题项目等。根据过往的评估改造经验，我撰写了《待到山花烂漫时》一书，被中国残联列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推广丛书。

自2021年担任江岸区政协委员以来，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工作。2023年国际残疾人日当天，由武汉市残联负责人带队，市区督导队联手行动，赴荟聚中心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宣传体验督导活动。

作为督导成员之一，我对荟聚中心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和建设标准提出了自己的



获评 2023 年湖北省劳动模范

意见，同时也建议从细节方面更加关注听障和视障人士的无障碍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设施设备。这些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为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如今，武汉越来越多的地铁站、商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每当看到残障朋友出行更加自如，我愈发坚信：无障碍环境是丈量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尺。

让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残障人士也不例外。就业对他们而言，是融入社会的关键途径，不仅能获得经济收入，更能收获尊严与自信。

从社会发展来看，残障人士同样拥有独特的才能与智慧。不少残障人士在艺术、技术领域大放异彩，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着行业发展。帮助他们就业，是对人才资源的充分挖掘。

在皓然众多残疾员工中，就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曾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19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四肢瘫痪，手指无法动弹，生活起居全部依赖家人照顾。旁人只看到了她身体的受限，可是通过聊天，我发现她不仅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还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女孩子，完全可以做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在皓然公益服务中心成立之初，我便邀请她参加工作，如今的她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能独挑项目重担，也能与团队合作。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只能躺在床上仰望天

花板的女孩，如今她是那样的自信与阳光，这是工作带给她的底气。

为帮助更多残障人士就业，我不时参与相关调研和座谈会，了解残障人士在就业和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以政协委员身份提出一系列建议。如：加大对残障人士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力度、建立残障人士创业支持体系、推动残障人士就业和创业的政策倾斜等。同时，积极推动一些残障人士就业、创业项目，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当我们在给予残障人士平等工作机会时，传递的是温暖与爱，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包容与进步。让残障人士更加阳光自信，让社会氛围更加和谐包容，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餐饮人的逐梦“食”光

◇ 朱天海

人物名片：朱天海，武汉枣阳商会副会长，武汉东湖光谷希尔顿欢朋酒店总经理，武汉龙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9年，29岁的枣阳王城镇村民谢元德带领6名乡亲按下红手印入股，办起湖北第一家农村联合体企业，从事农机具维修。随后的数十年间，搬进县城、入驻武汉，并最终走出国门，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开启了盛隆电气王国。

1984年，村民吴强阶在谢元德的带领下，在盛隆电气食堂从普通员工干到厨师长，后来创立水墨江南、九龙国际大酒店等近十座星级酒店。

1994年，我在吴强阶的带领下入职武汉餐饮行业，自此成为一个餐饮人，一走就是31年。

走出枣阳

我出生在枣阳王城镇的一个农民家庭。都说“农民的孩子早当家”，我深知父母的不易，努力为家里分担重担。1991年，14岁的我利用暑假时间走上街头卖冰棍，以进3分卖5分赚取中间的差价。我推着车，带着一个泡沫箱子装满了冰棍，顶着酷暑走街串巷叫卖，一天下来竟也可以赚两三块钱。这个经历让我感受到做生意的不易，但也体会到其中的快乐。

1994年高中毕业，家中叔叔让我去从政。那个年代的公务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在长辈心中，是铁饭碗，考上了就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我思虑再三还是拒绝了，我告诉父母想出门闯荡，想到外面看看，不想

一辈子走不出这个小山村。1994年下半年，我怀揣着50元，经过老乡吴强阶的介绍入职盛隆电气食堂帮忙打杂，自此开启了我与餐饮业的缘分。

农村出来的人具有天然优势：不嫌脏不嫌累，只要有钱赚就有用不完的力气，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后来我慢慢学习配菜、炒菜，每完成一道菜就让大家帮忙品尝，提出改进建议。失败了就重来，不断探索、总结各类菜品的烹饪方法。学会一道菜我会高兴得一夜合不拢眼，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2000年我成了家，此时已26岁。都说成家立业，家有了，业在哪呢？看着枣阳老乡们混得风生水起，我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我不想再当一个打工人，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当老板。

我拿出六年苦干下来、省吃俭用攒的几万块钱开了个小店做快餐，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门店。我给小店取名为“龙福园”，立志打造老百姓幸福的家园。

做生意做的是心态

2000年快餐店正式开张，前期积累的烹饪经验，让我做出的菜品非常受欢迎，每天的食客络绎不绝。虽说要起早贪黑，忍受酷暑严寒，但看到有这么多人喜欢吃，我就干劲十足。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从来都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家才开的新店生意如此红火，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我才把店铺打理妥当，慢慢走上正轨时，房东找上门来。原来签好的合同不认了，二话不说直接就要涨房租。我这才知道是隔壁两家看我们生意好，私下做了些小动作让房东把我撵走，他们来接手这个门面。



朱天海

本来都是小本生意，哪能接受房东漫天要价。无奈我只得白天在店铺忙碌，晚上出去找合适的门面。一条街不行就两条街、三条街……那段时间的扫街，让我对附近的小街小巷都熟悉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两个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门店。新店铺面积较原来大了很多，周围的人流量也大，很有发展空间。那时我就暗下决心：稳定后一定要扩大门面。

但好景不长，2003年，门口修起了路，客流量受到严重影响。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还遭遇了严重的疫情——非典。于是，餐馆难以为继，面临关门的危机。无奈之下我只好解散所有员工，只留下几个自家人。

那一年多我起早贪黑，天还没亮就走在买菜的路上，回来后不及歇息就要去炒菜，饿着肚子去给老客户送餐，整天连轴转。然而，无论如何艰辛，我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关门，路总有修完的一天，疫情总会过去的！

做生意做的就是一个心态，问题来了就去解决，没有过不去的坎，挺过去就好了。2006年，实现店铺重装与扩张；2012年，在汉阳开张龙福园第一家分店；2016年，进军武昌开设龙福园酒店；2017年，投资成立鑫海贝酒店管理公司……

好食材是餐饮的灵魂

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主要来源于每天摄入的食物和水。但在现代农业背景下，食材的农药残留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慢性中毒状态，过多的化肥使得土壤养分日益不平衡，食物自然也没从前好吃了。

每次回老家，总是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就是因为这些蔬菜瓜果天然无污染，食材好=食才好，饭更醇、肉更香、菜更鲜。

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为龙福园找优质食材上。我们酒店的鱼做出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我买的水库鱼，味道鲜美，肉质细嫩。绝大部分食材我都采购自家乡枣阳，村里种植的有机蔬菜、瓜果，养殖土鸡、土鸭、土猪，直供我的酒店，虽然增加了物流成本，但跳过中间商，跟武汉菜场里的价格基本持平。

现在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好好吃饭就是给未来健康储值。我们现在都提倡“新三高”，从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转变成情商高、智商高、收入高。

好味道好服务让龙福园的经营比较稳定。2019年，我将龙福园提档升级，酒店面积扩展，建成一个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综合型酒店。

2019年底完成整装，在我信心百倍时，现实又给了我无情的重击。农历庚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一时间

全国形势严峻。看着自己花费心血才重装完的鑫龙福园酒店，旁边开业的花篮都还没撤走，就要停业了，内心百感交集。

进，可能风险莫测；退，可能前功尽弃。这是守护了二十年的事业，我割舍不下。当时只能努力调整心态，静待春暖花开。

2020年5月份，疫情得到好转，鑫龙福园酒店正式营业了。虽然只有平时十分之一的顾客，但我告诉自己只要不倒下，就有无限可能，既要稳得住，也要守得住。

做有文化有情怀的餐饮人

在当今环境下要想做好餐饮，必须求新求变。填饱了肚子的国人，不再把“吃”仅仅作为一种基本的生理需要，而是把吃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去感受吃，品味吃，享受吃的乐趣，交流吃的文化。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吃出档次，吃出味道，吃出内涵，吃出风情，这就是舌尖上的文化。

我的家乡枣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它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境内有新石器时期雕龙碑古人类遗址、九连墩战国楚墓、白水寺等文化遗存，是一个底蕴十分丰厚的文化大市。

枣阳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餐饮文化如同一部活的历史书。相传，枣阳人刘秀过去起兵反莽，被王莽追杀几天没有吃饭，昏死在路上。是他的恋人阴丽华，用枣阳当地的小杂粮和山上的野菜，做成野菜酥饼，并熬制麦仁汤给他充饥，才使他苏醒过来，恢复体力，重上战场，击败了王莽大军。这两道美食现在仍然是枣阳餐桌上的家常菜，被后人称之为“丽华酥饼”“刘秀麦仁汤”。

除此之外还有四井岗油桃、枣阳酸浆面、枣北黄牛肉，吴店甘蔗、牛油面、夹沙



酒店一路提档升级

肉……枣阳美食数不胜数，我想把这些美味带到武汉，所以正在筹备打造“汉襄宴”，只要想吃襄阳菜就来我这儿，绝对正宗。

另一方面我延长餐饮的产业链，回村成立了农业公司。王城镇是务工大镇，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多，我们抱团发展，靠经营建筑、餐饮、屠宰（俗称“三把刀”，即砌刀、菜刀、杀猪刀）打天下，成就了事业，涌现出数十位资产过亿的企业家。

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铺开以后，镇委镇政府向我们发出倡议，引导我们在农村“两基”（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产业方面贡献力量。政府的感召、故乡的情怀，牵动着游子的脚步，我也成了回乡的一员，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名誉村长”，通过农业公司集中采购村民农产品，同时流转土地种植粮食蔬菜。村民除了获得土地收益，还能在农业公司打工，我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投资农业是需要情怀的，在城里投资

几百万收益立竿见影，在村里修路、平地样样要花钱，钱花进去了也看不到收益。

前年我拿着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究出的新型黑米种子，在村里开展种植试验。这种黑米的种植要求极为苛刻，要选择靠近山坡的水田，半天接受光照，半天保持阴凉，用野草沤肥，管理极为精细，米很好就是种起来很费神。转念一想，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就如许许多多的乡村，产业弱小、人才缺失、村庄空心、农民老龄等问题普遍存在，而机械化、产业化、农场式一定是未来农村的出路。

所以，我种的不仅仅是粮食，更多的是希望吧！

江南鏖战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四

◇ 涂文学

日军占领九江后，军中弥漫一片乐观气氛，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意欲一鼓作气，旬月之内攻克武汉。于是调集第9、101、27师、波田支队及特种部队和海军，总计兵力15余万人，分别向南（南昌）浔（九江）铁路和瑞（瑞昌）武（武宁）公路进军，意欲尽快占领瑞昌和德安，并攻克南昌。中国军队吸取序战经验教训，调整作战部署和作战方式，以薛岳第1兵团和张发奎第2兵团分兵布防，严阵以待，激烈的战斗在长江南岸展开。

瑞昌战役与德安战役

江南一线作战，首先是瑞昌战役与德安战役。

中国方面，薛岳10个军约26个师以主力固守南浔路正面，阻击日军南进，并在鄱阳湖加强驻防，以阻止日军南攻南昌的企图；另一部驻德安西部地区，以便侧击西进日军。张发奎以7个军18个师布防瑞（瑞昌）阳（阳新）一线，重点防守瑞昌沿江地区，阻止日军沿江西进。与之前的序战各战役战斗短暂、日军快速攻占安庆、湖口、九江不同，南浔战役和德安战役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采取较为灵活的运动战战术，从1938年7月底至9月底，持续达2月之久。“如果说日军在九江的屠城行动是为了让长江上游的中国军民感到恐惧而丧失抵抗意志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失算了，在接下来的战略要点，即距九江10英里的知名商业中心——瑞昌（在广汉铁路线的西边），



激战后的瑞昌城抗战宣传壁画依然醒目

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这次战役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在这里，中国军队把日军拖进了反复的拉锯战中，张发奎将军所率部队的英勇战斗使得日军每向前推进一公里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有一支日军在向南昌突进，但他们很快就在庐山山区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由于战线过长，供给线被切断，这股日军只得返回瑞昌，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战斗”（〔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50）。

日军方面，占领九江后，为掩护其南侧翼之安全，分兵向南浔铁路和瑞武公路进军。守卫在瑞昌附近的张发奎部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在瑞昌以东高地上严阵以待，第22师以一个旅在瑞昌东北天子山、牯牛岭及丁家山、望夫山、陈家之线构筑主阵地和前线阵地；以一个旅担任九江、瑞昌公路的警界守备；第81师守备沿江渡口下至倪湾铺之线，并控制有力部队于水鱼山、栗子脑附近；第20师在大山山、拱山岩、雷鼓山、牛下膊构筑阵地；后又令李仙洲第2军从修

水开往瑞昌东侧（参见李少军主编《武汉保卫战史事日志（军事卷）》，武汉出版社即出）。

8月8日，日军以一部于瑞昌东北的港口登陆，但被守军击退。10日，日军再次登陆，随即占据望夫山和平顶山。孙桐萱命部队全力反攻，再次将日军击退。但日军不甘失败，大举增援，在炮舰掩护下，第三次登陆并占据二山。15日，日军另一部在徐家望江岸登陆。到8月下旬增派大量部队，向瑞昌大举猛攻。中国方面虽然增派关麟征第32军团参

战，但未能扼止日军攻击势头。22日，波田支队在屋何、城子镇施放窒息性毒气，致使第81师2个营的官兵中毒几乎全部牺牲（3人幸免于难），该师师长率4个营约700人坚守乌龟山、赤水村之线。日军猛攻卓山、陈家山、牯牛岭阵地，激战一整天，国军死伤惨重。日海军和空军积极配合从江上和空中向牯牛岭、卓山、安成桥、武山周围、白水渡、汪家等阵地扫射轰炸，攻占瑞昌北面和江南岸的城子镇。24日，波田支队进至瑞昌附近，国军第21师、第54军第14师增援第81师，凭借塹壕和碉堡，与日军拼死肉搏，但在日军海陆空联合攻击下，终于不敌。午后，日军一部迂回城北高地切断国军退路，一部炸开城东门，傍晚瑞昌失守。“同时，敌舰以鄱阳湖之鞋山为根据地，配合空军进攻星子。我为避免地势不利，乃放弃星子，转守东孤岭阵地”（《武汉会战经过1938年6—11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20）。21日，星子失守。

日军占领瑞昌后，继续在瑞昌外围发动进攻，指向德安。25日，第9师团向鲤鱼山、笔架山阵地进攻，国军第72军反击后向西南转移。日军继续派出增援部队穷追猛打，辛潭铺、岷山、大屋李等阵地相继不守。南浔路左侧顿感威胁，守军增加部队与敌发生争夺战。

9月2日，日军又增兵一联队向马回岭突进，守军与敌激战竟日，晚上被迫放弃马回岭，向南转移。我南浔路正面部队，亦向马回岭以南阵地转移，对敌作战形成有利态势，日军直下德安的企图暂被扼止。21日，日军27师团沿瑞武路向西南迫进，企图攻占武宁以威胁德安。26日，麒麟峰阵地被突破，守军王陵基、李汉魂两部协力反攻，击溃日军并在次日收复麒麟峰。10余天中，我军进行50多次反攻，双方伤亡惨重，国军725团团长郑克已壮烈牺牲，日军众多中下级军官战死。27日，日军又以一部南窜层岭；德星、瑞武二条公路的日军分途突破，盘踞在层岭、万孤岭一带的日军则居中策应。

中国军队集中兵力全力歼灭策应之敌，10月6日调德星路之叶肇军增援，协同欧震、俞济时部猛力围攻。瑞武路一线，歼灭日军3500余人，缴获炮14门、轻重机枪48挺、马步枪460支、骡马100余匹。10日，日军27、101、106等师团各一部约4个联队被歼灭。“俘获械弹辎重文件无算”。下旬，日军在德安附近的佛寺大举强渡，守军与之反复争夺，敌军炮火猛烈，守军伤亡惨重。28日，德安失守。

德安之役，中国军队矢志坚守，殊死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第133师伤亡官兵3200余人；第793团团长徐昭鉴负重伤，所部3个营长牺牲；第797团副团长滕军甫殉国，第794团团长和2名营长负伤；第

397团除1名营长外其余营长全部牺牲，是第“20军在8年来抗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涂文学、刘庆平主编《武汉城市通史·沦陷卷》柯育芳著第二章《武汉会战与武汉沦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万家岭大捷

按照日军的战略安排，其南浔路、德星路和瑞武路战役，目的在于突破南浔线，攻下南昌；打通浙赣公路和浙赣铁路，西攻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合围之势。但是，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行动一再受阻，进展缓慢，从7月末一再持续到9月下旬。参加作战的第101、106师团伤亡惨重。在此情况下，日军派第27师团于西路沿瑞武线进攻武宁，准备迂回中国军队左侧背，诱使南浔线守军西移，为其正面第106师团南进创造条件。

9月16日，日军开始行动。24日，第27师团一部冒险深入到德安西边的白水街以西地区，在瑞武线上的要地南屏山被薛岳部第91师、142师切断后路而陷入困境。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获悉后极为恐慌，25日急令南浔线上的第106师团第123、145、147等3个步兵联队 and 山炮兵部队及德星线上的第101师团第149联队从马回岭、星子等地火速增援，向德安西南五台岭推进。“第一百零六师团于9月25日从马回岭地区开始西进，着手突破五台岭。前进道路的很多地方连驮马通过都很困难，地形的交错复杂和地图不准确，加以夜向行动有雾气等原因，连自己队伍的位置都认不出来，师团内各部队之间也经常失掉联络”（《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14）。26日，第106师团过五台岭后继续西行，国军第4军在闵家铺、大小金山、何家山等处对其展开截击。27日，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阵地，接着兵分两路向二房郑、梨山前进。28日，第106师团3个联队和山炮兵部队及第101师团149联队，在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指挥下开进万家岭地区，以图



万家岭战役中国军队依托残墙对日军射击

“冲出自槎，窜扰南武公路”，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

万家岭处崇山峻岭之中，位于江西德安县城以西50公里处，由德安至万家岭沿途皆为山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第106师团孤军深入，给中国军队提供围歼的绝佳机会。第1兵团司令长官薛岳迅速调集第74军和第187师、139师，会同正面阻击日军的第4军从东面包围，又电令在瑞武路作战的第91、142、60、19和新编第13、15、预备第6师等从西面包围，共调集部队约12个师10余万人，根据万家岭地形特点，部署成“反八字形阵”，将敌军围而歼之。

28日，第91师在何家山南北之线，对敌106师团展开进攻和截击，顶着日军战机轰炸和炮火炮击，激战竟日。据106师团30日向军部的报告，师团主力与中国军队第90师、91师混合部队交战，28日与后方联络中断，“因天气不良，飞机侦察和补给都不能进行”。30日，第90、139师继续在万家岭与日军激战打退进攻；第91、142

由小坳折回，包围日军侧背；第74军第58师第348团开始向万家岭日军展开攻击。

10月1日，预备第6师、新13师、第155师与敌106师团在梨山、何家山一带发生激战，第74军第58师在万家岭南面高地与敌展开阵地争夺战。106师团向军部的报告说，“本日傍晚切断箬溪大道，但与优势之敌遭遇，因此于10月2日申请对当面之敌予以轰击，并要求指定师团位置”。2日，天气转晴，106师团通过飞机侦察，终于弄清了其所在位置，结果发现其推测位置与实际地点偏南10公里。3日，中国军队在岭下、刘家、何家山、凤凰山与106师团交战，第90师从大金山攻击面前山、靠背山、杨家坂之敌，占领杨家坂及万家岭北端高地，第91师在周村与敌终日激战，第58师半夜突入万家岭南面阵地展开肉搏战。

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使日军深陷困境，106师团的报告说，“在南田铺地区和优势之敌激战，形成混战状态。师团司令部也处于危险状态。军虽以空投弹药和粮食以及

对敌轰炸支援了师团，但师团的粮食极端不足”（《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14）。

面对危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亲自部署对106师团的增援和救助，所派部队包括宇贺支队、佐枝支队和铃木支队共3个支队。宇贺支队“10月2日，从九江出发，顺瑞昌—簪溪大道前进，10月7日到达簪溪，准备追赶师团”；佐枝支队“8日从簪溪附近出发，击败途中之敌，11日进入簪溪正南偏东约10公里附近”；铃木支队11日“从九江向簪溪急行……于13日追上佐枝支队，继续进行攻击，于15日午后进入甘木关”（《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14—315）。

4日至6日，中国军队与日军战斗持续进行。4日，第74军第58师攻占箭炉苏以西高地，与在万家岭制高点及其西侧高地的日军对阵，击退其多次反攻。日军106师团重新占领杨家坂东端、万家岭北端国军第90师高地，但进攻狮子崖被击退。5日，第139师在张古山、杨家山、城门山，第102师、58师在狮子崖、大金山、墩上郭、张古山，第187师在长岭等地与日军激战。6日，张古山北部阵地失陷，国军全部壮烈殉国，日军也付出惨重代价，鬼冢大队只剩下数十人和1挺重机枪。

7日下午，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更为强大攻势，攻占长岭和张古山，并在夜间将106师团包围。日军出动航空部队侦察、轰炸和空投物资予以配合，但因地图与地形不

合，空中配合并没取得预期效果。8日，第949团在老虎尖与日军血战并占领老虎尖，第90师在鸡公岭、狮子崖、大金山多次击退日军反扑，但据守张古山制高点的第74军一部因敌机猛烈轰炸而全部牺牲。9日，战斗更加激烈。蒋介石命令薛岳必须在这一天全歼万家岭日军，以向“双十节”献礼。中国军队组织了13支敢死队誓与日军作殊死搏斗，日方也空投了数十名军官参战。下午6时，国军夺回梨山、扁担山、大金山、杨家山等阵地，最后将包围圈缩小在南田铺、雷鸣鼓和潘家3个村庄约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是夜，第51师在张古山、第58师在箭炉苏与日军作战，其中张古山4次易手。

张古山高地于敌于我都是致命之地，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以此为最后撤退之希望，中国军队占领了张古山就等于断了106师团最后生路。因此，第74军军长俞济时命令51师和58师死守阵地，58师打到连师长冯圣法身边的警卫、参谋甚至伙夫都派上了前线，10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剩下500来人。王耀武第51师接力上阵，主力在张古山正面向敌人进攻，而153旅则组织突击队从后山悬崖攀爬上山偷袭，日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张古山高地最终被中国军队收复，彻底断绝日军撤退的唯一希望。

10日，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总攻，第66军进攻箭炉苏、长岭，第142师进攻哗叽街，第91师进攻张古山、哗叽街，第187师在长岭南端策应，第74军由长岭、张古山南面阵地进攻长岭、张古山北端，炮兵对箭炉苏、哗叽街、张古山北端、长岭北端之间地区猛烈炮击。日军虽然出动侦察机和轰炸架配合106师团作战，但国军灵活应对，敌空袭效应递减。在猛烈进攻下，106

师团防御阵地几近雪崩。第66军收复万家岭、田步苏，第4军收复扁担山、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第74军收复张古山南端、背溪街，第91师收复杨家山东北无名村，第142师收复杨家山北端高地。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几乎绝望，几度准备焚烧军旗和切腹自杀，最后只带500残兵突破重围。

11日，万家岭战役更加激烈，薛岳命各参战部队继续围歼日军。日军加强对106师团的空中支援，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对围歼106师团的中国军队实施连续密集轰炸；地面支援部队铃木支队和佐枝支队在铃木春松的指挥下共同行动，进攻106师团正面国军之侧背。佐枝支队在上桂堂与国军交火。国军第91师的一个团奉命星夜开往甘木关，抗击敌增援部队。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106师团形势更加危急，据11日早上乘机在106师团司令部周围一带观察报告，东西1000米、南北2000米以内四周高地及山脊之间要点，都被国军占据，两军相距最近处只有几百米，浓烈的尸臭甚至飘到飞机上。

12日上午，天气阴沉，日军战机无法起飞，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时机，在沙田港至罗垅之线阵地、狮子崖、墩上郭、长岭、张古山、杨家山、城门山、窟山、杨家窟、猪头嘴、康头尖、梧桐尖、上庐、河浒之线阵地，对长岭、张古山附近及杨家山、丰桂尖之敌发动攻势。下午，天气略有好转，日军海军第15、12航空队及陆军第3、4飞行团先后出动轰炸机、攻击机，对田步苏、杨家山、熊村东南、长岭东面山峰南麓、张古山西南国军阵地实施密集轰炸，造成田步苏阵地国军重大伤亡。

13日，日军援军陆续到达并攻下东山、

梧桐尖，国军虽然次日反攻一度恢复梧桐尖阵地，但15日在守兵全部牺牲后再度失守。国军在梨美山、卢家山一带阻击敌援军，并击毙随宇贺支队行动的106师团新任参谋长富成一中佐。随着日军援军纷至，战场总体形势于中国军队已大为不利，甚至有可能被日军反包围之危险，薛岳乃决定开始有计划撤出战场。

16日，日军106师团被打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残余部队，向南方逃窜。17日，国军从甘木关、万家岭撤离。据日军战史记载，“10月17日，甘木关地区之敌，开始总退却，南下的第一百零六师团和铃木支队取得联系，第一百零六师团脱离了危机”。关于106师团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战史未予披露。事实上，万家岭战役几乎让106师团全军覆没。中国方面的战史记载，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生俘日军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0余挺、步枪3000余支、山炮16门、迫击炮28门、战马300余匹。陈诚10月8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说，106师团参战人员为26000人，死伤二分之一，达13000人（《陈诚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8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48）。但日方的记载其死伤数字大大缩小，日军第11军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说，106师团仅战死740人，负伤1795人，患病347人，总共2882人。但《熊本兵团战史》和《图说中国事变》的统计数据与中方记载较为接近，前者记载战死3321人，伤4085人，病9905人，总计17311人；后者则说战死3300人，负伤4000人，病9900人。综合来看，《图说中国事变》统计数据都是整数，《熊本兵团战史》具体到了个位数，可信程度显然较《图说中国事变》要高得多。

鄂南战役

从8月下旬到9月初，长江南岸战火蔓延到了湖北境内。日军在湖北境内长江两岸的首要作战目标，是夺取武汉在长江上的最后门户田富要塞——北岸田家镇要塞和南岸富池口要塞。

富池口位于富水入长江处的南岸，北岸为半壁山。中国军队统帅部深知富池口和半壁山对于武汉的重要性，以第54军第18师驻守富池口、第98军第193师第562旅驻防半壁山。蒋介石在富池口保卫战开战后电令第18师师长李芳彬：死守半壁山、富池口，如果后退，应将师长及官兵就地枪决。

日军担负进攻任务的主要是波田支队。9月14日，40余艘舰船在空军掩护下向富池口发起进攻。16日，波田支队主力进至黄土桥东北面牛栏山附近，一部进至老屋柯东北面邓家山，遭到顽强抵抗。17日，富池口东南高地刘家山、邓家山、鸡笼山等相继陷落。18日，波田支队猛攻黄土桥附近小河之线上的阵地，第9师团攻占黄土桥南面的大脑山、北侧的吴家脑高地。19日，继续猛攻黄土桥、坡山等阵地，遭到第54军第14师的英勇抵抗；波田支队攻占竹林塘及其东北面高地最高点；第9师团右翼队攻占黄土桥南面对门山高地。20日，日军将主攻目标转向朱婆山和背膀山，第18师顽强抵抗，伤亡惨重。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调兵增援。23日，朱婆山失守，第18师退守富池口，李芳彬只身逃离，

不知所踪。24日中午，波田支队在空军配合下攻陷富池口要塞，第18师残部退至半壁山。

富池口保卫战，自9月14日开始至24日陷落，持续时间整整10天，日军一面攻占刘家山、邓家山、竹林塘、鸡笼山、朱婆山等外围阵地，一面以主力在空军支援下猛攻富池口要塞，国军第18、11、49、50、51、193师等部队虽据险抵抗，但一方面所筑工事殊为薄弱，不堪攻击；另一方面主要指挥官畏敌怯战临阵脱逃，致使富池口迅速为敌所陷。

富池口失陷后，国军第53军等部在富河北岸和阳新县城附近地区构筑防线，并以重兵驻守半壁山要塞——第98军第385旅（加强旅），人员7200人，其中第10团为机械化炮团，配备有6门克虏伯榴弹炮、11门75毫米野炮及15门150毫米重榴弹炮、4门75毫米高射炮和2个高射机枪连，另



日军在阳新半壁山上用旗帜引导海军

在网湖一带、半壁山以西亦部署了一些 75 毫米野炮和 150 毫米榴弹炮,以期亡羊补牢,守住武汉在江南地区最后一道门户。

日军对半壁山“志在必得”,除波田支队外,又组编高品支队予以配合。高品支队包括第 15 师团第 60 联队、第 50 联队第 1 大队、第 67 联队第 3 大队和第 51 联队第 3 大队的 2 个中队,外加独立转装甲车第 8 中队、野战重炮兵第 10 联队、迫击炮第 4 大队第 2 中队。26 日,46 架战机对半壁山阵地整日轰炸不停,陆战部队从长江南岸上沙上岸,准备进攻半壁山炮台。至 30 日,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 7 次强行登陆,皆被 385 旅等守军击退。此外,日军在富池口到半壁山沿江狭窄走道和富池口到阳新县城一线发动攻势,第 53 军第 116 师、130 师与战,一周内损失兵力三分之二。29 日,江北田家镇失守,半壁山失去重要屏障,高品支队在海军舰艇支持下在韦源口登陆。

10 月 4 日,波田支队和海军吴镇第 5 特别陆战队,在 32 艘军舰和 46 架飞机的配合下,在上水口登陆。半壁山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两个营全部壮烈殉国,第 385 旅当晚奉命撤出,半壁山要塞陷落。

日军在进攻富池口、半壁山要塞的同时,第 9 师团在排市、辛潭铺一线与国军第 25、54 军作战。10 月 2 日,排市陷落。6 日,日军强渡富水,猛攻箕心脑等阵地。11 日,第 27 师团攻陷龙港;12 日,又攻陷尖山、石坑。17 日,在两路日军夹击下,辛潭铺、三溪口陷落。24 日,阳新县城失守。与此同时,日军进犯石灰窑,并分三路进犯大冶。21 日,大冶失陷。

长江南岸的鄂南战役,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国军方面,富池口守卫战,第 18 师兵员损失大半,仅撤出 2000 多人;半

壁山守卫战,第 53 军兵力损失几近三分之二。日军方面,据日方战史资料记载,波田支队伤亡超过 3000 人,第 9 师团伤亡接近 4000 人,而中国方面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远不止此,粗略估计超过 3 万人。

阳新、大冶陷落后,日军加快了从鄂东南向武汉进攻的步伐。“10 月中旬,长江南岸之敌,除对南浔路取守势外,主力于陷我阳新、大冶后,分三路积极西进:一路由辛潭铺向通山道;一〔路〕沿三溪口、高桥、咸宁道截断粤汉路;一〔路〕沿大冶、鄂城会合沿江部队,直攻武昌;并另以一股经金牛向贺胜桥截断我军退路。长江敌舰复突破我封锁线,向武汉急进”(《武汉会战经过 1938 年 6—11 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21)。

中国统帅部不甘失败,10 月 21 日,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决定组织 3 个攻击纵队共 7 个军 10 余师在鄂南地区进行反攻,但 25 日,反攻的军队却接到撤退命令,所谓反攻消于无形。21 日,日军沿鄂(城)武(昌)公路迅速西进,当日攻陷鄂城。23 日,巴铺失守。24 日,葛店陷落,武昌城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钢老领导沈因洛的调研风范

◇ 肖萍

2003年，我对个人长期从事的企业调研工作进行一番总结，整理出一本《转型期国有企业的调研与思考》。书稿付梓出版之前，我想请我的老领导——曾任武钢政策研究室主任、誉为“武钢一支笔”的彭利同志为之作序。

彭利阅读书稿后，充分肯定我的调研成绩，却没有应允为书作序的请求，但他想到一位老领导——曾任武钢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沈因洛同志。

作为武钢人，沈因洛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他一贯重视且身体力行企业调研工作，长期工作在武钢，十里钢城百里矿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武钢人心目中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

彭利长期跟随沈因洛参与各项调研活动，熟悉沈因洛的工作特点和个性风格，能由沈因洛为书稿赐序，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沈因洛离开武钢多年，先后任湖北省委书



2003年12月29日，沈因洛在家中与作者合影

记、湖北省政协主席职务，跟这么大的官儿打交道，自己小兵一个，人微言轻说不上话。

彭利说“这件事情我来联系试试看”，不久他果然联系上了沈因洛老书记，沈因洛老书记也果然答应作序，并用挂号信在最短时间内，寄来他老人家签名的《代序》文稿。

身体力行深入班组家庭

武钢人知道，在武钢发展史上，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正是由于沈因洛和党委一班人带领广大职工不断攻坚克难，才使武钢这个共和国钢铁长子发展壮大，逐步走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鼎盛时期。

那是1960年代初期，投产不久的武钢面临苏联撤专家、毁合同及三年困难时期，一度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

此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沈因洛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从解放军部队选调的四名成员之一，充实冶金企业领导班子，从军营来到武钢。他着一身旧军装，背一个黄挎包，骑一辆自行车，不辞辛劳奔波在生产现场调查研究的身影，就是那个年代领导干部的“标配”形象。

沈因洛起初担任副经理，主管企业财务工作，正是通过一系列艰苦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了生产经营管理的薄弱环节，制定出一系列经济活动分析制度，开展群策群力的增产节约运动。这样，促进武钢在1961年亏损2900万元、1962年继续亏损2000万元、1963年预计还要亏损的被动局面下，一举扭亏为盈，当年实现盈利1508万元，为武钢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0年代，国家决定将重大引进项目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放在武钢建设，沈因洛作为项目谈判团团长和一米七投产的主要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倾注全部心血。一米



1980年7月16日，沈因洛陪同邓小平视察武钢

七轧机项目的引进，事后证明不仅是一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造、再创新的成功实践，也有力推动了武钢产品质量品种结构的全面升级，是武钢发展史上一座重要里程碑。

然而，一米七轧机投产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被日本专家描绘为走下坡路的“日渡曲线”，西德《每日镜报》也从负面角度报道，引起社会上下的广泛关注。

面对严峻的生产形势，沈因洛断然采取措施：武钢机关处室的主要领导，每晚集中学习一米七技术工艺和全面质量管理知识，每周抽出时间到生产现场，以主要精力抓一米七生产；一米七系统生产厂家各级领导，全部集中起来日夜兼程进行上岗前的思想和技术培训；作业线上的操作工人广泛开展“择优上岗”的技术练兵活动。他还把《每日镜报》的报道印发给全体职工人手一册，发动一场“中国工人阶级究竟有没有志气和能力，掌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艺操作技术”的思想大讨论，叫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为社会主义争光、各项工作争一

流”的“三争”口号，最后形成武钢人的“三争精神”。

为了促进工作抓落实，沈因洛带头选择一米七系统的冷轧厂五机架这个生产关键部位，作为自己工作的联系点，并在极其繁忙中每周抽出时间深入车间，接触干部和工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段时间，彭利身为政研室干部，时常跟随沈因洛左右，知晓了不少沈因洛广泛接触工人群众、深入开展调研活动的佳话。

“在长达10个多月的蹲点活动中，他几乎接触了车间的每一名职工。他还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走访了这个车间65户基层干部和工人家庭，占这个车间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曾经有一名青工把沈书记要来家访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不敢相信还骂儿子胡说，没想到沈书记如期而至来到了这位青工的家里。”彭利这样描述不辞辛苦深入调研的老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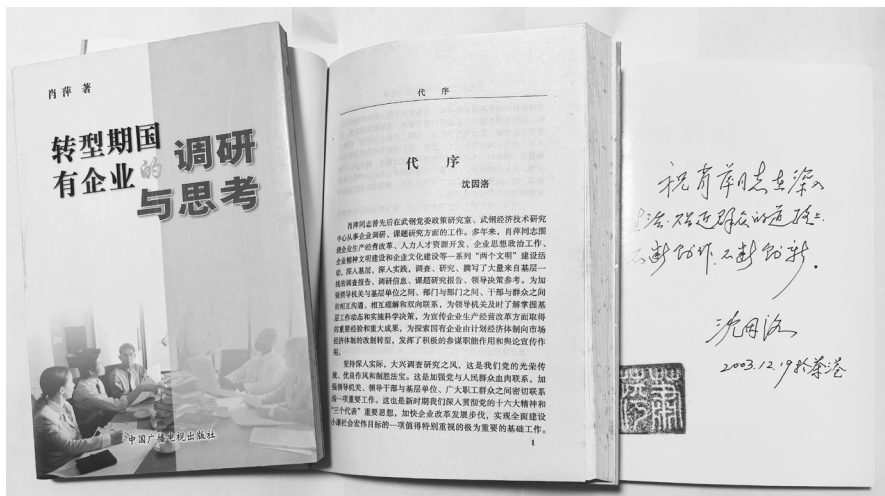
彭利说，沈因洛深入基层、深入职工搞调查研究，绝对不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他在与职工群众的深入接触中，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从指导思想的高度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如操作工人每天来来回回去食堂去打饭，生产轧机就要停产半小时到一小时。他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冷轧厂改进后勤工作，使用工作快餐，提高饭菜质量，送饭菜到车间，因为“饭菜里面有钢铁呀！”冷轧厂改进后，有效压缩了轧机非生产时间，进一步提高了轧机的生产作业率。

作序寄语强调企业调研

沈因洛在我书稿的《代序》中，再次重申和强调企业调研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深入实际，大兴调研之风，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制胜法宝。这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加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与基层单位、广大职工群众联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我们就是要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调研工作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减少决策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增强制定和实施各项措施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这部由沈因洛签名作序的书稿，2003年10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收到书已是新年元旦前夕，我带着书和感激的心情，特意邀请彭利老主任一道赴武昌水果湖茶港一号楼，专程拜谢沈因洛老书记。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们来到一幢具有苏联建筑风格的老旧别墅，步入朴素得令人惊讶的会客厅。沈书记与熟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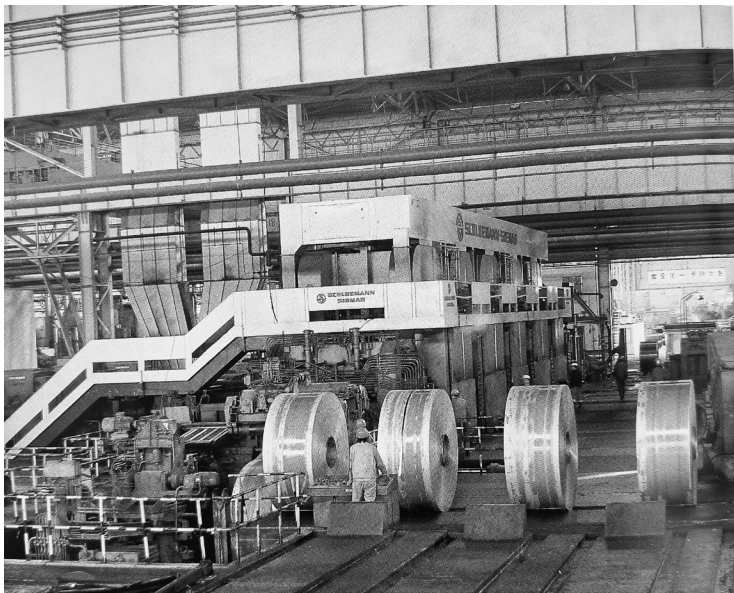
沈因洛为作者调研专著作序并题寄语

的老部下握手寒暄后，问起我的工作学习情况，当得知我在调研工作之余，还写点文艺作品，先后加入了武汉、湖北两级作家协会时，颌首赞许。借此机会，我拿出书请老领导题写几句鼓励的话，他欣然在扉页上题写——“祝肖萍同志在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创新。”

随后的交流过程中，沈书记谈兴尤浓，话题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也包括正在进行的企业重组和对外贸易。他对我们说，事物总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对我们党的既定方针一定要有信心……听老书记侃侃而谈，你能真切感受到他尽管离休多年，可依然思维敏捷，思考探索的轨迹未曾停歇；他对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信仰坚定；他对包括武钢在内的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倾注了极大关注；他也诚如身边工作人员所一致评价的那样，是一个“特别爱学习”“一辈子爱学习”“终生爱学习”的老领导。

辞别前，我给沈书记和彭主任拍摄了一张合影，同时也请彭主任给我和沈书记拍摄一张纪念照。我和沈书记站在客厅那幅“松鹤延年”挂轴前，很少摆弄照相机的彭主任端着相机，显出十分认真又十分笨拙的样子，让沈书记和我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事后，彭主任一直担心“要是照片没拍下来，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好在这张照片构图不错，记录下了沈书记的风采，也成为我难忘的记忆。

此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拜访前我对茶港一号楼充满了各种想象，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绕客厅大半圈儿是蒙着灰色



沈因洛调研联系点——武钢冷轧厂五机架冷连轧机组

沙发套的旧沙发，沙发后沿墙壁一根塑料绳悬挂着老同志互相唱和的诗词字画。几扇窗子的窗框落漆斑驳，有风吹过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更让我吃惊不已的是，沈书记招呼我们落坐，我一下差点窝到沙发里面去了，原来沙发弹簧早就崩塌损坏，只得一直支楞在沙发的边边上。总之一句话，这次拜访，完全颠覆了我对省委书记别墅楼的想象，它甚至不如武钢许多一般职工家庭的住宅舒适度。后来沈书记搬家了，是一幢在茶港院内新建的高层住宅。有两年春节，我随彭主任等老同事去拜年，看到沈书记的新居依然朴实无华，除了他夫人常弹的一架钢琴外，几乎没有一件特别打眼的家具……

肖萍，武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原高级研究员

项英黄陂家世考

◇ 裴高才

笔者在编纂《李家集街志》与参与筹建黄陂烈士纪念园期间，搜寻到中外多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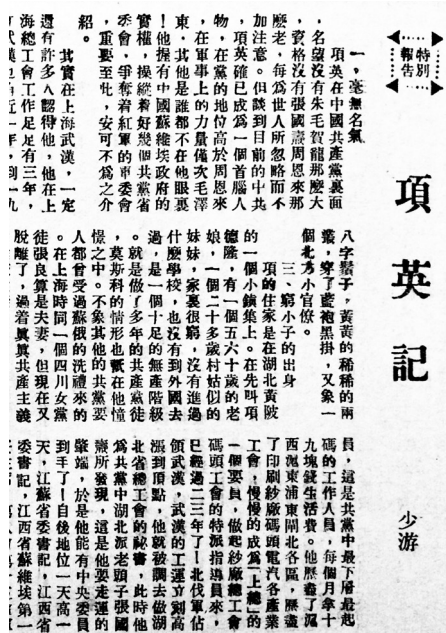
始史料，经考订证实：项英祖籍在湖北省黄陂县崇义乡李家集大彭家砦（今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大彭家砦村），生于湖北省城武昌涵三宫项家花园（今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附近）。对此，项英后辈及历史学者严昌洪、李良明、曾成贵等予以认可和肯定。



武汉中学的项英铜像

项英祖籍在黄陂

早在1931年，项英（1898—1941）在自传中称自己是湖北黄陂人。党史专家、华中师大李良明教授介绍，包惠僧的早期回忆亦称项英是黄陂人。因项英之父项观乾晚清从黄陂迁往武昌开店铺，项英1898年5月22日出生于项家花园。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出版物中，发现1932年7月22日上海《文化日报》第三十二号载《项英记》一文，从“毫无名气”“貌不惊人”“穷小子的出身”等方面，形象描绘了项英的黄陂故乡、方言、外貌与个性特征。

《项英记》开门见山说“项英的住家是在湖北黄陂小集镇上”，这与《项氏宗谱》记载的祖籍湖北省黄陂县崇义乡李家集镇集北大彭家砦相吻合。同时说“穷小子”项英本名“项德隆，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娘，一个二十多岁村姑似的妹妹。家里很穷，是一个十足的无产阶级”。

据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儿子项学诚、孙子项阳回忆，项英1931年在自传中曾称自己是黄陂人，项苏云在履历表上也填“湖北黄陂”。笔者在中央档案馆查证，中共六大期间，项英按照中央分工，曾撰写已故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郑覆他、许白昊传略，可印证项英撰写个人自传的缘故。

《项英记》描述项英“夹杂着黄陂话与汉阳口音的普通话”，休闲时常哼楚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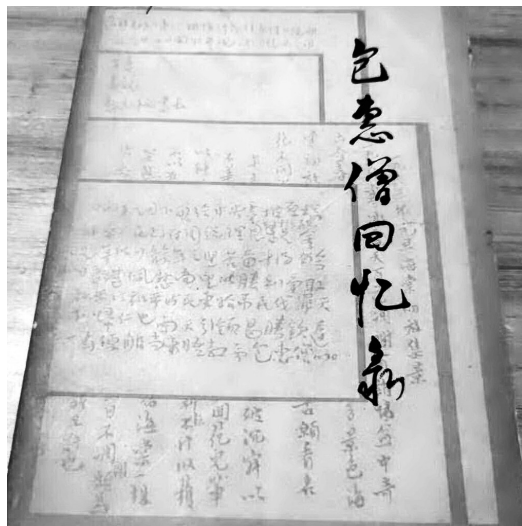
汉剧。黄孝花鼓戏发源于黄陂，清末传到汉口，北伐军会师汉口后更名为楚剧，黄陂有“会唱三句戏，到老不怄气”的民谚。

迄今发现最早刊发项英小传并称其为黄陂人的书籍，是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中国的红星》，书中下编“现在的红星”《中苏副主席——项英》一文写道：“项英，湖北黄陂人……”

另一本由冯玉祥将军题签的一本《抗敌将领印象记》中，《项英的过去》写道：“项英是湖北黄陂人，现年四十多岁。（1937年）9月28日报载，作为七省辖区游击队总司令，项英正在率部集中候编，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对外！”同年4月出版的《大时代人物·项英》一书，亦称其为“湖北黄陂人”。

时至198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载：“项英（1898.5—1941），湖北黄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10月10日发布的项英简介：“项英，原名德隆，湖北黄陂人。”

缘何长期以来称项英是武昌或江夏人呢？这与行政区划沿革相关。项英的出生地



《包惠僧回忆录》追忆项英投身工人运动



由于项英英年早逝，武昌县以为项英与房东一样都是舒安乡人。项阳回忆，先是武昌县司法局长项城保前往北京，找项英后裔续族谱；1981年他随姑父林汉

方志谱牒明世系

项恒敬传到第七世项璧，其父项小塘原是黄陂县崇义乡李家集镇北的大彭家砦彭氏，因自幼过继给湖北云梦舅家而改项姓。项璧妻子黄氏生育一经、一纶、一纬、一绍四个儿子，后带领长子一经重返大彭家砦刻苦读书。一经考入省城武昌江汉书院



(今粮道街武汉中学处)，项璧于是寄居汉阳府城照顾。

清代榜眼金国均编纂的《黄陂县志稿》云，项一经，字克赞，号韦斋，黄陂人，曾寄籍汉阳。顺治十六年（1659）荣登顺治乙亥科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候选推官、建德（今杭州西南）知县与贵州按察使等。

同时，笔者综合考订清乾隆十二年《汉阳府志》、汉阳与黄陂《项氏宗谱》发现，项一经是一位为民做主的能吏。他任建德知县期间，重建范仲淹创建的龙山书院。康熙十二年（1673）冬，三藩之乱爆发，耿精忠叛军劫掠蹂躏闽浙。项一经明察暗访发现，邑中为非作歹之徒亦蠢蠢欲动，断然率家健会营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夜缒城讨平之。由于他身体力行，谨守四封，民得安堵，深受康熙嘉许，先后被擢为工部虞衡司主事、吏部考功员外郎与吏部郎中。事隔五年，他以吏部郎中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选拔了一批英才。

项一经生平以公正廉洁著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南汝道副使时，因辖地五省交界，群盗啸聚，杀人于途。他密擒渠魁杀一儆百，余党猢猻散。由于他重惩横索，民皆感悦，后晋升贵州按察使。后因铁面无私断然除奸，开罪了皇亲而被参奏，遂辞职还乡，先隐居于黄陂李家集项家畈。不久，偕大侄儿迁往大彭家砦，小侄儿留居项家畈。因此，项一经成为黄陂项氏一世祖。

项一经在黄陂安度晚年期间设馆育人，百年之后按他的生前遗言，灵骨埋葬于大彭家砦之九邱湾祖墓，衣冠葬于汉阳县新安堡



1939年6月15日，《良友》杂志刊登的斯诺文章

村。1987年5月9日，在汉阳县彭山镇新安堡村发掘项一经墓，出土一顶铜质官帽，上有龙纹、蝙蝠图案，附有“奉”“天”“日”铭文。

项一经的一支后裔，在黄陂大彭家砦传到第八世项维（因排行老二，人称维老二），十年寒窗取得功名后，在武昌司门口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职员，这得到项英嫡孙项阳援引其父项学诚生前口述证实。项维膝下育有四子：观善、观庆、观乾、观坤。第九世观乾育长子德龙（又名德隆、项英）、次子德生（又名民生）、女儿德芳。

父亲新疆遭杀害

据黄陂《项氏宗谱》载，光绪元年（1875），黄陂项氏在大彭家砦南兴建了一栋两层楼项氏宗祠，专设项一经神位。宗祠设有项氏塾馆，聘名师任教。1980年代初，李良明教授曾在项英长女项苏云处看过项辛（又名云旺，原沙市市政协副秘书长）写

给她的一封信称，黄陂项家是大户，鼎盛时有“项八桌”之称。这与大彭家砦宽敞的项氏宗祠相印证。生长于大彭家砦的项观乾在这里上私塾，业余还练就一身裁缝手艺，后与发妻夏氏在黄陂县城与省城武昌开设裁缝店与染织坊，移居涵三宫。

清末，辛亥志士在武昌发动革命。黄陂蓝天蔚会同刘成禺、李书城一行留日期间，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宣传民族独立、光复中华。蓝天蔚回国后，又与黄陂万声扬及李廉方等革命党人在武昌花园山聚会，传递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毗邻花园山又是黄陂同乡的项观乾，在阅读这些革命书刊后深受影响，常以笔名在进步报刊抨击清廷腐败，被当局列入通缉黑名单。幸亏担任武昌慈善会会长的弟弟项观坤暗通消息，项观乾遂将妻子及儿女德隆、德芳委托弟弟照顾，偕几个徒弟连夜逃难，落脚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义甫街。

在迪化，项观乾重操旧业生意兴隆，并与何氏再婚，1907年生育次子德生。远黄陂老家的二兄项观庆，几经周折来迪化找到弟弟观乾，观乾唯恐二兄千里迢迢返回老家易遭不测，遂将迪化的商铺交给他打理，自己偕妻小转移到何氏的娘家——新疆最西端的昌吉州玛纳斯县。

在玛纳斯县城中心，项观乾开有多个店铺，生意红火。随后，他发起创办湖北同乡会会馆并任会长，但随着影响逐日扩大而走漏风声，惨遭官府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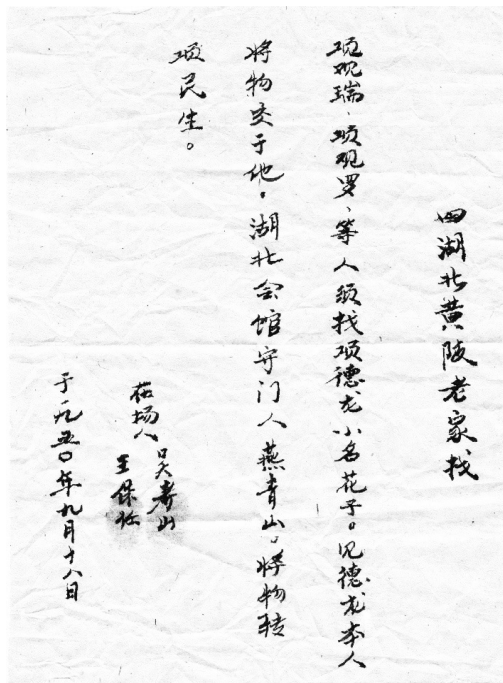
旧时黄陂民间约定俗成，一旦步入六十花甲就要添置寿木。湖北同乡会馆人员料理项观乾后事时，发现他生前准备的棺木中，留有手书的字据及遗物二份，并委托其徒弟燕青山在字据上作证签字、按手印，希望待德生成人后转交。同时还要求德生回

黄陂寻根，将另一份遗物交给长子德龙即项英，遗物由其纺织的棉布并染成酱红色包裹缝合。

后人老家续亲缘

项观乾身后，湖北同乡会与何氏娘家人合力经营其产业，直到项德生成人独立经营。1950年9月18日，燕青山不负项观乾所托，将遗物包裹交给何氏，当场立下字据，并请街坊证人吴寿山、王保任现场签字按手印。字据云：回湖北黄陂老家找项观瑞、项观罗等人，须找项德龙，小名花子；见德龙本人将一物交于他。湖北会馆守门人燕青山，将二物转交项民生。在场人：吴寿山、王保任（手印）。

1950年代公私合营时，项德生出任公私合营卫星商店主任，夫妇养育玉兰兄弟姊妹六人，均学业有成。只是，父亲遗嘱寻亲



1950年8月10日，燕青山所留寻找项德龙（项英）的字据



项阳(右二)、项金国(左一)及作者(右一)在武汉中学拜谒项英铜像

之事，一直未了。项德生晚年嘱咐三女儿玉兰，一定要回黄陂老家寻找家人。2008年，项玉兰踏上千里寻根路，经黄陂老家项金国牵线，终于找到项苏云。

项苏云(1931—2022)、项学诚(1935—1974)姐弟在延安长大，1950年代留苏。项苏云留学莫斯科医科、动力与纺织大学，回国后历任纺织部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等职。项学诚留学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回国后曾任海军潜艇支队航海业务长，1974年英年早逝，项阳成人后也应征入伍。

项金国向项苏云展示黄陂《项氏宗谱》，与项玉兰提供的字据相对，两代人的名字完全吻合。在项金国的见证下，这对堂姊妹当场打开项观乾留下的包裹，发现是和田玉砚台、手镯与玉器雕件各两份。传给德龙的一方砚台为观乾生前所使用，给德生的一方玉镌刻着“梅花香自苦寒来”。

项苏云、项玉兰相约一起回黄陂认祖归宗，实现了祖父遗愿。项金国向项玉兰与项阳赠送了《项氏宗谱》。

由于当年家人向项英隐瞒了项观乾遭文字狱、逃难新疆遭受追杀的死因及另组新家之事，所以项英留下的文字只提及父亲早亡、家中有母子三人。

2013年春，武汉市武昌区政府决定，在项英革命故居原址武汉中学校园兴建“项英将军纪念亭”，由项苏云请迟浩田将军题写亭名。亭中立项英烈士铜像，由黄陂宗亲、著名雕塑家项金国教授塑像，项英嫡孙项阳监制。12月10日，项苏云、林汉雄伉俪，项玉兰、项阳联袂出席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参考文献：

- [1]《项英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2019年。
- [2](清)金国均：《黄陂县志稿》，道光年线装本，第538页。
- [3](清)乾隆十二年《汉阳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0页。
- [4]《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614页。

裴高才，武汉市黄陂区委统战部原调研员

从“显真楼”看武汉近现代史迹

◇ 郭广迪

“显真楼”是武汉著名的老字号照相馆，1881年由严添承创办，是湖北人在本地最早兴办的一家照相馆。



作者小时候的“全家福”

1955年夏天，我的大姐将去广西工作，我们家在当时位于武昌司门口的“显真楼”拍摄了一张“全家福”。

最近，年过古稀的我看到这张“全家福”，就想起“显真楼”，于是查阅大量史料追寻其有关信息。从它拍摄的照片看，无疑折射了武汉近现代政治、文化、商业的发展。

从孙中山到恽代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由张之洞主导编练的湖北新军在武昌打响。吴殿英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期帮助他创建和训练湖北新军，吴殿英的儿子吴稚英也曾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1909年，吴稚英在“显真楼”拍摄了一张“全家福”。



清末吴稚英的“全家福”

历史学者冯天瑜在《图片影像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正是以他的朋友吴欢所收藏的这张曾祖父吴稚英的“全家福”，作为“显真楼 20 世纪初年的作品”，用以说明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摄影术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开放的沿海沿江城市）已有相当的普及度”。



鄂省各团联合会欢迎中山先生



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

沈汉生被业界称为“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第一人”，在他藏品中也有两张“显真楼”拍摄的照片：“鄂省各团联合会欢迎中山先生纪念照”和“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前者拍摄日期为“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日”，即 1912 年 4 月 10 日。

辛亥革命时期，“显真楼”拍摄过“孙中山西服半身像”“黎元洪半身像”和“孙中山和黎元洪合影像”，后者“一次就印制了 3000 余幅，在数日内销售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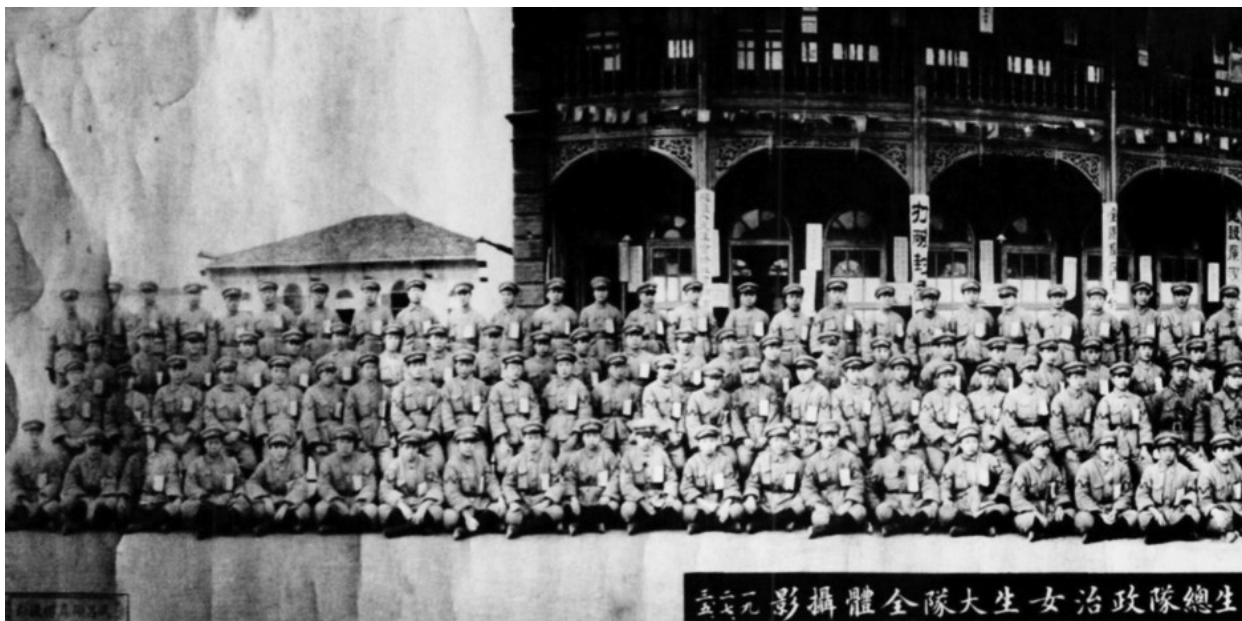
1912 年 4 月，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邀请孙中山访问武汉，拍摄了“孙中山和黎元洪合影像”。



孙中山、黎元洪合影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以及“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吴佩孚、胡汉民等，都在“显真楼”照过相。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也在“显真楼”拍摄合影。

1927 年 3 月 5 日，“显真楼”摄影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内，为黄埔军校女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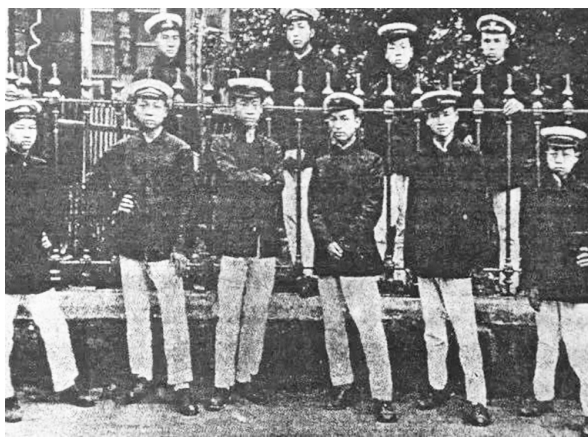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合影

队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学之初，委任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李汉俊为政治教官。

恽代英于1917年在武昌发起和组织了互助社，这一“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进步社团”。1918年6月19日，他与互助社的其他9位社员，来到“显真楼”拍摄合影留念。



恽代英等互助社社员合影

1923年，李汉俊在“显真楼”与陈静珠女士拍摄结婚照。



李汉俊、陈静珠结婚照

从梅兰芳到王玉珍

黄巍在《摄影的画家与画家的摄影——关于美术专业摄影基础课程的设计构思》一文中强调，“摄影”与美术中的“绘画”都“属

于视觉艺术”，“两者的关系千丝万缕”。“显真楼”的创办者严添承与其孙子严云开的经历，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严添承“年轻时喜欢书画，曾在黄鹤楼前摆摊，以画肖像画和卖字画为主”，后来他向“一位日本摄影师”学习摄影技术，创办了“显真楼”。

严云开则与其祖父“相反”，1949年他才13岁，就被父亲安排到“显真楼”

当学徒，不久到湖北省美术工作室工作，后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美术设计师，成为了一位动画电影艺术家。严云开创作的水彩画《历史蜃楼》，实际上是位于蛇山原址“显真楼”景观的写真图。



严云开水彩画《历史蜃楼》

可见，严云开就是“摄影的画家”，严添承则是“画家的摄影”。

民国时期，“显真楼”为中国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拍摄过一张便装照。1951年7月3日，梅兰芳、武克仁、崔嵬和武汉戏剧界有关人士，



1951年梅兰芳与武汉文艺界朋友合影

又在“显真楼”拍下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

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初，收藏者黄明忠在旧书摊发现一张印有“显真楼”标记的老照片，并发现坐在前排中间的两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影剧表演艺术家崔嵬，就买下这张照片。1997年，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女儿梅葆玥应邀来武汉演出时，黄明忠将这张“连梅兰芳纪念馆也没有”的照片请梅葆玖看。梅葆玖“非常肯定地说，这是1951年梅兰芳率团来武汉时拍摄的”，指出其中很多人士的名字，并同姐姐梅葆玥一起在照片上签名。



《洪湖赤卫队》韩英造型

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查询到一些“显真楼”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武汉显真楼分店拍摄的“《洪湖赤卫队》韩英造型”。

1959年11月，湖北省歌剧团赴北京剧场汇报演出歌剧《洪湖赤卫队》，“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其中“贺龙提议，将《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拍成彩色电影”。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制片厂联手拍摄，女主人公韩英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玉珍扮演。



从商业革命到手机照相

有学者在《近代武汉商业革命述论》一文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的商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即开始了“向以现代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商业形态的转变”的“商业革命”。在谈到“现代商业营销的广告宣传手段”时，提到1920年《汉口商号名录》“显真楼照相馆”广告“三十年，历来应用欧美新法”，并称该广告“刊登于武汉书业公会1920年出版的《汉口指南》的第276页”。不过，有学

《汉口商号名录》中的显真楼照相馆广告

者则认定，《汉口指南》实际上是1920年由“武汉书业公会编纂、上海商务书馆出版的《汉口商号名录》”的附录。也就是说，早在武汉近代商业发展之初，“显真楼”已开始运用反映新时代特征的经营方法等。

另外，《中国历史照片档案的分布与特点》一文，在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馆业在中国的发展时，所指出的其中“比较著名”的照相馆就有“武汉的显真楼”。在《从“照相”到“造相”》一文的

“1919年之前的重要摄影传入城市及由本土摄影师开设的照相馆”表格中，也有“1881年”“严添承”在“武昌黄鹤楼”开设“显真楼”照相馆。

《品读武汉老字号》一书在“代序”中告诉读者，当我们“品读武汉老字号”时候就会发现，它们的成长与武汉城市的发展是“同频共振”的，它们发展的



1956、1957年拍摄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照

“黄金期”则是近代武汉商业发展的“高光时刻”。

由此可见，包括“显真楼”在内的老字号，对于武汉近代商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原因正如《老武汉商业习俗一二》一文所说，“‘老字号’的金字招牌”“是商业信誉的保证”。

有人指出，1949年以前，湖北省在市场竞争中催生了一批包括“显真楼”在内的“代表性品牌”，但在1949年之后，则“随着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传统的老字号均被取消，品牌经济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品牌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前面所展示的“洪湖赤卫队韩英造型”照片，显然是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1960年代拍摄的。而上面这两张照片，则是“公私合营”后的“显真楼”，在1956、1957年分别拍摄的“支援武汉长江大桥纪念”和“长江大桥留念”。后者是在1957年10月15日长江大桥通车后的11月拍摄的，照片下方的两行字为“显真楼照相”“武昌中华路66号”。可见，当时“显真楼”不仅在照相馆内为顾客照相，还在像室外长江大桥这样的重要景点为顾客照相。也就是说，这一老字号仍然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百年显真楼》一文也表示，直到21世纪初，“一说到武昌最早的照相馆，人们就会想到显真楼”，“许多久居武昌的人家”所珍藏的老照片多半都是“由显真楼摄制”。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这些在近代创办的老字号，1949年之后虽然经历了“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改造，但直到21世纪初，对于老武汉人来说，仍然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是随着电子化、手机大众化和快递、外卖等的广泛应用，



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来“显真楼”拍照

一些老字号才逐渐消失。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照相业”，因为手机可以拍照，即“你的手机就是你的照相馆”，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到照相馆去了。

1999年4月，“显真楼”已经“经营不景气”，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专程来这里拍照以示支持”。

《老照片：见证40年百姓生活变迁》一文称，到了20世纪末，“显真楼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2001年“一位民间人士重新扛起了显真楼的招牌”，才使其得以“重新延续”。这里所说的“民间人士”，就是与严氏家族没有直接关系的操安乐。据查，操安乐曾是“武汉市显真楼摄影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昌区显真楼照相馆水果湖分部”的“法定代表人”。不过，位于司门口的“显真楼总店在21世纪初由于拆迁而没落”，其“水果湖分店也于2015年停止营业”。

综上所述，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显真楼”这一老字号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其所拍摄的历史照片，对于研究武汉近现代史，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郭广迪，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武昌凤凰山：凤凰来集，楚天灵瑞

◇ 喻 球

武昌是一座有 1800 年建城史的古城，曾有夏、鄂渚、夏口、江夏、郢城、鄂州等称谓，历来为省、州、府、县的治所，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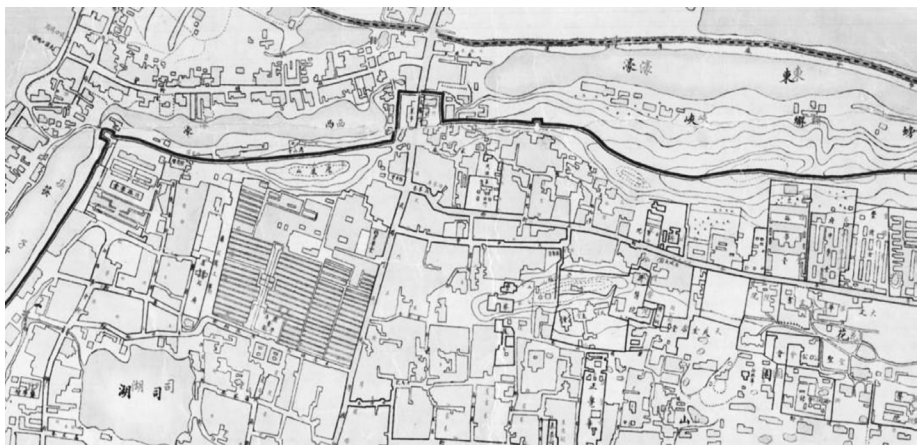
武昌凤凰山，是武昌地区最早有记载的一个地名。三国时期，有“东龙西凤”之说，东段山体为黄龙山，西段山体为凤凰山。由于黄龙山呈蟹钳形，人们习惯称之为螃蟹岬，后来演变为城外叫螃蟹岬，城内叫凤凰山。在悠远的武昌人文历史中，逐步孕育形成了武昌凤凰山文化。

笔者之所以关注武昌凤凰山，缘起有三：其一，是成为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宗故事第五代传承人；其二，是参与建造昙华林近代教育博物馆；其三，是组织打造

武昌中华路文旅资源地图。2023 年 5 月，经重新对相关文史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总结，在文史学者吴修志的指点下，首次对“武昌凤凰山文化”命名、定义的外延作了初步界定。

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武汉科技大学张继才教授、湖北省博物馆何广研究馆员编著的《昙华林编年史》一书前言说：“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武昌老城东北角，为胭脂山、凤凰山、螃蟹岬和古城墙所环抱。地势起伏，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它是武昌古城之根，也是武汉历史的缩影。”正文开篇，即写了“凤凰山”得名、凤凰山下“孟宗哭竹生笋”。

武昌凤凰山，包括狭义的地理区域和



1909年的武昌凤凰山周边地图

广义的文化区域。其地理核心区具体指的是“武昌凤凰山遗址”，包含三处：东吴孙权称帝祥瑞所在处、孟宗哭竹生笋所在处、武昌贡院所在处。地理周边则涵盖了中华路、粮道街、黄鹤楼、积玉桥等街道，包含了昙华林、花园山、胭脂山、螃蟹岬等地方。文化区域主指武昌古城涵盖范围，乃至历史上武昌府所辖地区。

武昌凤凰山，是湖北文脉之根，突出体现了国泰民安的中华祥瑞文化、爱国爱家的中华民族美德、敢为人先的中华教育实践。这里，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沃土、中西文化并生的花园，也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前沿、历史名人成长的息壤。

中华祥瑞文化的代表地之一

中华祥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现象，祥瑞就是吉祥的符瑞，是预示国祚坚固、天下兴盛的吉兆，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

祥瑞开端即人文开端。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祥瑞就是“河图洛书”，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梦槐，见麒麟游乎楚苑，得美玉以喻天下；西汉董仲舒

认为祥瑞是“受命之符，天人之应也”，而“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

武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的核心区。因文而华，是长江文明的杰出代表；以武而昌，是九省通衢的中华天元。

武昌源远流长，源头

可以追溯到先秦鄂渚、古云梦泽，属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楚国的地盘。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于黄武二年（223年）在武昌黄鹤山西北跨山筑城，取名夏口，开启了武昌古城历史。武昌古城先后经历三国夏口土城、南朝郢州石城、唐宋鄂州陶城、明代武昌砖城、晚清鄂督扩城、民国十年兴城等6次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最终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凤凰山名字始于三国时代，据《江夏县志》记载：“吴主孙权黄龙元年（229年）四月，武昌有黄龙凤凰现。”凤凰山，即“凤凰栖此”，又称“凤凰来集”。

三国时期，孙权想称帝，需要一个好时机。刚好这时江夏（今武昌）出现黄龙、凤凰并现的祥瑞之兆，迎合了孙权的心情。此时天下三分已定，登基时机成熟，于是欣然称帝，并取东龙西凤之说，以武胜门（当时并无此门）之处为界，将东段山体定名为黄龙山（今螃蟹岬），西段山体定名为凤凰山，以此作为吴国的龙脉所在。

据传，1100年后，刘伯温到此察看，认为武昌确有王气，而龙脉所在处就是螃蟹岬。为防后患，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扩建武昌城时，至螃蟹岬跨山而

筑，将一部分切在城外，借以斩断龙脉，破坏武昌的王气。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人们逐渐淡忘了两段山体的来历，仅将城外山体称为螃蟹岬，而将城内的螃蟹岬（黄龙山）误称为凤凰山了。

武昌凤凰山，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拥有着丰富的城市记忆，是武昌城内九湖十三山和清代武昌十景之一。同时，也是武昌城的屏障和制高点，历来有“欲制武昌，先制蛇山，欲制蛇山，先制凤凰山”之说。武昌城北城墙依凤凰山、螃蟹岬建立，是武昌城的北大门。

凤凰山在武昌首义中起到关键作用，起义军炮营在凤凰山炮台开炮，南打都督府，北击清军进城之援军，成为战事的转折点。解放后，凤凰山曾为高炮阵地，护卫武汉，护卫长江大桥。

几千年来，祥瑞文化贯穿整部中华史。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永续不断的历史，也就是祥瑞的不断发现史。楚人崇凤，武昌凤凰山泉水潺潺、书声琅琅，成为钟灵敏秀、惟楚有材的宝地，彰显不凡的文脉根底、祥瑞气象。随着社会变迁，也逐渐融入民俗文化之中，成为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文明象征。

中华民族美德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美德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可以继承，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有益于下代的优秀道德遗产。

武昌城的“老九门”中有个“忠孝门”（今小东门），“忠”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有关，“孝”与三国东吴司空孟宗有关，一忠一孝两大历史名人共同铸就这个地名。母亲深明

大义，儿子忠孝双全，家教良好、家风端正，一起载入华夏史册，体现出武汉人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深厚情怀。如今，忠孝门不见踪迹，只留下一条不长的忠孝门路。

孟宗（218—271年），三国时期东吴江夏人。为避孙权之孙皓字元宗之讳，改为孟仁，字恭武。起家骠骑军吏，迁监池司马，拜吴县令。历任光禄勋，迁右御史大夫，后官居吴国司空。

稽考孟氏，亚圣孟子第十九世后裔孟宗，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和西晋前期，自江夏郡鄢县（今河南罗山县）迁居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遂定籍于斯。孟宗逝世后，葬武昌阳辛县车桥（今湖北省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东晋陶渊明亦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所记载。

孟宗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大被”“还鲊”等传奇故事广泛流传。二十四孝故事家喻户晓，其中第十七则故事“孟宗哭竹”，就发生在三国时期的武昌凤凰山。

孟宗的父亲孟康是三国曹魏时的著名学者，精通天文地理，著有书籍《汉书音义》。孟宗小时候，父亲为民除盗贼很早去世，家境贫寒。母亲郭氏靠在岸边搬罾和纺线织布维持生计，但没有放松对他的教育。17岁那年数九寒冬，孟母重病中想吃鲜笋，孟宗到凤凰山竹林中悲泣哀叹，鲜笋竟从地下生长出来，他使用笋煨汤喂母亲吃，母亲病情随之好转。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右大司马丁奉、司空孟仁卒。”裴松之注《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累迁光禄勋，遂至公矣。”《说郛》卷五八载《楚国先贤传》

与此同。元郭居敬《二十四孝》辑入此事，故称“哭竹生笋”。

明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卷十五写到：“在府城北二里凤凰山下，即孟母墓也。”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本《江夏县志》（清陈元京修、汪知松纂）所载贡院图标注“凤凰山”“孟母冢”。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江夏县志》（清王庭楨修、彭崧毓纂）记载：“孟母墓在县北凤凰山麓，即宗母也，又云宗墓附焉。”据原武汉图书馆馆长沈畴春1962年《孟宗故宅》（手抄本）记载，有“孟宗哭竹生笋处”石碑、“吴司空孟母墓园”石碑坊。抗日战争之时，墓园被毁，仅存两截湖北按察使所立墓碑、江夏县徐七彦所立禁碑。

孟宗在武昌城有多处遗迹，除了凤凰山遗址，已知的还有孟宗祠遗址（今武昌民主路蛇山五坡的“辛亥武昌首义遗迹之张难先旧居”、忠孝门遗址（今武昌小东门忠孝门路处。）等几处。《湖北通志》记载：灵山寺，汉明帝马师在此所建。据传，汉末至三国，这里是孟宗故宅，五代时改为纪念孟宗的灵竹院，南宋时孟珙在此建孝感王祠；明弘治九年重建灵山寺。1929年，张难先在此购地建房，为小院署名“灵山窝”，邀请弘一法师书写。建房时还曾挖出一方石额，上书“孟宗祠，裔孙孟珙”字样。还有一些遗迹消失在历史尘烟之中，包括孟宗宅遗址三处（《孟氏宗谱》第二册附录《江夏县志》记载）、应山祠遗址（武昌凤凰山北麓）、宜孝巷遗址（武昌胭脂路北段处，古巷凤仪巷和孝子巷合称而来）等多处。

孟宗故事经过数代武昌人口传心授、薪火相传，目前已形成以武昌凤凰山遗址为起源的武昌城传奇故事五代有序传承。2011年，“孟宗哭竹生笋”故事入选第三批湖北

省非遗代表性名录。2023年，笔者执笔的新编倡廉情景短剧《凤凰山下》，作为武昌古城1800周年的献礼剧目，以一线串三珠之法，将武昌凤凰山及周边的故事串起，在昙华林非遗广场首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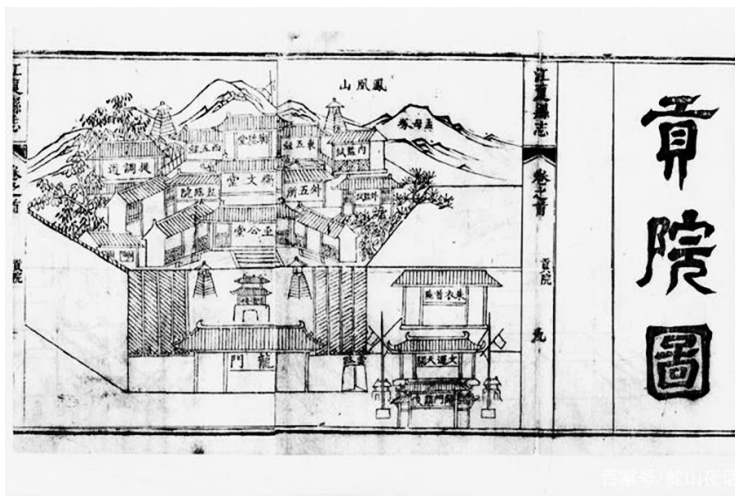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刘守华先生，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奠基性贡献。他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华精神文化的植被。

小孝孝于亲，大孝孝于国。武昌忠孝门所体现的“爱国爱家”优良传统，是英雄城市的基因血脉之一。孟宗、岳飞故事传奇，跨越了时间、地域、语言、文化，乃至远播海外。因此，推进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开展统战文化创新实践，为“画出最大同心圆”注入澎湃动力，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程，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武昌作为州治、府治之所文脉兴旺，在于古代传统教育在此聚焦，新式教育改革也在这里开启，从以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为代表的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直至公办、民办、教会大学，武昌成为中国南方文教中心。

武昌贡院初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位于武昌凤凰山南麓，宋初在此设县学，后改为州学，文庙和贡院都曾在此。明洪武年间设“湖广贡院”，永乐年间独立单建，清雍正前是湖北、湖南“乡试”唯一场所。在此前后，有太平试馆之设。武昌贡院作为南方最高等级的科举会试中心，半壁江山的读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江夏县志》贡院图

书人常年聚集于此。其时，贡院是武昌城最大的建筑群，东沿得胜桥至戈甲营，西从菊湾东街至黄巷，南抵青龙巷，北依凤凰山。

武昌凤凰山还开办过几所学校，如公立法政学校、私立法政学校、中等农业学校等。1920年，何膺恒先生辟贡院一角办女子小学，是为现武昌实验中学之前身。

明远楼是武昌贡院的最高建筑，每逢贡院举办乡试，主考官就会登楼俯瞰整个贡院监考。2021年，明远楼复建竣工，坐落于凤凰山之南脚下，为重檐歇山式建筑。

“惟楚有材”最早可溯源到《左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由清顺治年间湖广总督林天擎首次提出。咸丰八年（1858年），湖广总督胡林翼重修毁于太平军战火的武昌贡院及牌楼，请曾国藩题写“惟楚有材”。1958年，“惟楚有材”牌楼因大风倾覆。2006年，“惟楚有材”传说入选武汉市第一批非遗保护名录；2010年，“惟楚有材”木构牌楼按老照片式样重建，面北为曾国藩旧题“惟楚有材”，面南为著名书法家陈义经新题“辟门吁俊”。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昌办教育成绩斐然，领一时风气之先。张之洞创办书院、改

书院为学堂、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创办文教设施……奠定教育现代化基础。湖北人才济济，武昌城英杰辈出，客观上为武昌首义准备了必要条件。

武昌凤凰山及周边，是湖北文脉和中国近代教育发源地、辛亥革命策源地、湖北红色革命摇篮、近代学术发祥地、抗战文艺主战场等，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1920年春天，董必武创建私立武汉中学，为培养革命人才奠定基础，走出三位中共一大代表。近百年来，武昌城冠盖如云，名人如潮，多少豪杰借此方寸之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历史大戏。

武昌之所以能引领一时风潮，称之为“活的武汉近现代史”，究其原因，是知识传播启迪了民智，先进思想冲破了藩篱，现代教育无疑是这里一切辉煌之滥觞。

武昌凤凰山的千年传奇和文化故事，勾勒出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保护、传承、弘扬武昌凤凰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继承中华民族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激发情感共鸣、文化认同。

武昌凤凰山遗址，可谓是武汉地名传说故事中的一笔浓墨重彩，向全世界展现出英雄城市的人文厚度。

喻球，武汉意品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致公党武汉市委教科文专委会秘书长，民间文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三）

◇ 刘宝森

“汉口号”飞机与分金炉水上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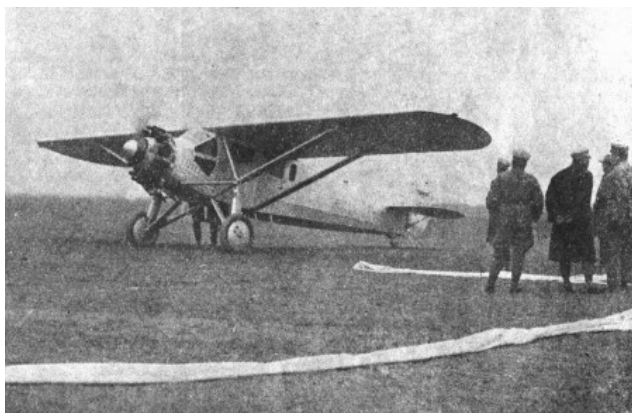
“汉口号”飞机为瑞安·包格尔 B-1 型单发动机活塞螺旋桨上单翼客机，美国莱茵飞机制造公司生产，汉口民用航空公司（湖北地方政府官商合办）购买了 3 架。

1929 年 1 月，女飞行员鲍会秩驾驶“汉口号”运载邮件至广州，成为中国第一位邮政飞机飞行员。

2 月 24 日，“汉口号”由航空处处长张维、

教官崔沧石等驾驶试航襄阳。这天襄阳天气骤变，大风大雾飞尘蔽天，驻襄特派员金家骊两次电请改期以避风险。张维认为不碍飞行，乃复电金家骊，下午 3 点半由汉启航。起飞时，“襄阳号”“长沙号”“上海号”一同起飞欢送。“汉口号”依汉平路向北直行，经钟祥、京山折至汉江，再循汉江飞向西北。过京山时，适值大雪颇难辨路，驾驶员奋勇前行，5 时 20 分安抵樊城，欢迎民众达两万人以上。

此前 1928 年 6 月，国民政府筹备开辟



“汉口号”飞机及首次飞行抵达广州时受到热烈欢迎

沪蓉航线，购买美国史汀生型上单翼客机4架，但上海至汉口航段试飞多次，始终未能开航。

1929年春，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兼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孙科，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亦称美国航空开拓公司）签订航空运输及航空邮运合同，合资组建公司。5月购进5架洛宁OA型飞机。10月12、13两日，试航上海—南京—汉口航线。

航线开通仅10天，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竟将合同规定的美方权益，转让给美商经营的中国飞运公司，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及合同中的垄断霸道条款，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迫于压力，孙科辞去理事长职务。1930年8月1日，重新组建新的中国航空公司，又购进5架洛宁OL型飞机。

洛宁飞机是美国洛宁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单发动机双翼活塞螺旋桨水陆两用飞机，1928年出厂，分为OA和OL两种型号。动力装置为气冷放射式发动机1台，功率为575马力。机长11.33米，机高3.87米，翼展14.42米。因为舱内噪声太大，旅客需用棉球塞上耳朵。座位空间较小，旅客的腿也不能伸开。

中航汉口办事处设在三教街53号。1931年4月1日汉口至宜昌线开通，10月21日展至重庆。每周来回飞行两次，由汉口经沙市、宜昌、万县到重庆，航程891公里。

因是水陆两用机，中航要求相关城市必须建水上飞机场。此前1929年，武汉利用长江水面，在太古洋行下游设汉口分金炉水上机场，设浮码头1座，配有汽车可直达的大型趸船，使用至1938年关闭。抗战初期，中航迁至汉口，以武昌东湖为基



1930年，中国航空公司购买的洛宁飞机

地设水上机场。

沙市水上机场设在二郎门，事务所设在二码头1号招商局。宜昌水上机场设在美孚油栈前，事务所设在滨江码头18号。万县水上机场设在聚鱼沱，事务所设在万安桥。重庆水上机场设在美孚洋行前，办事处设在聚兴诚银行2号。

1930年12月，“洛宁2号”在上海失事，补编的同号飞机命名为“安庆号”，“洛宁3号”命名为“汉口号”。此“汉口号”与前述“汉口号”是不同型号的两架飞机。

1931年12月22日，中航董事会第13次会议记录显示：8月11日长江一带飓风过境，“汉口号”飞机在汉口降落时螺旋桨突然脱落，将机头打断，是夜停靠江边，不料夜间被风吹走。次日派人沿江寻觅，终无下落。

武汉公共航空开端

1929年4月17日，孙科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代表威廉·B·罗伯逊在南京签订三项合同，其中《中美航空邮务合同》第二条第一节规定，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以中国航空公司名义，开办上海—南京—汉口、南京—

徐州—济南—天津—北平、汉口—长沙—广州3条航线，并取得专利权。

10月12日至13日，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进行上海—汉口航线第一次试飞，自此开启武汉的公共航空。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远东记者埃德加·斯诺随机同行报道：“……我们轰鸣，我们像精力充沛的精灵，漫不经心地迅速穿过云层，掠过它那饱经蹂躏的领地……”，热情欢呼这个航班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10月21日，沪汉线正式通航。上午8时，孙科乘坐伯格·约翰逊驾驶的“洛宁一号”从上海龙华起飞，下午3时抵达汉口。21日10时，欧内斯特·艾礼逊驾驶“洛宁二号”从汉口起飞，17时降落上海龙华，随机带有百余封邮件。

1931年10月21日，沪蓉线之汉渝段开航，以汉口为起点，途经沙市、宜昌、万县，班期为周三、周六上行，周四、周日下行。

1937年8月23日，中航迁址汉口办公。12月4日，开通汉口—长沙线，后延伸至广州。16日开重庆—香港线。1938年，中航迁至重庆。10月日军逼近武汉，中航在汉办理撤退飞行15架次。

抗战胜利后到1948年底，中航所开航线抵达汉口的计7条，东到九江、南京、上海；南到衡阳、桂林、广州；西到重庆、成都、昆明；北到北平、西安、兰州等地。

在汉设有办事处的另一家航空公司，即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股创办的欧亚航空公司，1938年8月前开有北平—广州经停汉口及北平—汉口、汉口—香港、汉口—西安等线。8月战事紧张，欧亚将飞机全部集中在重庆—汉口、桂林—汉口两

线飞行，至武汉沦陷时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8月中德断交，1943年3月欧亚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抗战胜利后，央航汉口办事处设于汉口沿江大道93号和武昌中正路365号。1945年11月，央航开辟的5条新航线中有3条经达汉口。1948年底，央航航线抵达汉口的计5条，东到南昌、南京、上海和福州，南到柳州，西到重庆、成都，北到西安、兰州等地。

1946年10月，美国第14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取得在中国领空载客运货的权利，抵达武汉的航线有南京—贵州、汉口—广州。1947年3月，国民政府空军第三军区空运队利用每天从汉口往西安运送军用汽油等物资返回之便，先为商人空运棉花得利，后开通上海—南京—汉口—西安定期航班，公开对外出售客票。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民航局开始筹办恢复航线。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批准同意“自8月1日正式开航”的计划，首先开辟天津—汉口—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航线。7月31日，民航局总飞行师潘国定驾驶“北京号”从天津起飞，载14名乘客成功试航广州。8月1日8时30分，天



“北京号”机组人员在机前合影



武汉—清迈国际航线开通

津经汉口飞往重庆的首航班机 XT-139 号飞机，自天津张贵庄机场起飞。同日 10 时 30 分，“北京号”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向北飞去。当天中午，两架飞机在武汉南湖机场先后降落，欢迎人群向飞机师献花、为飞机披彩，举行长达两小时的首航成功庆祝活动。15 时 10 分，两架飞机再次起飞，18 时左右分别在天津、重庆降落。

自此，武汉市公共航空旅客量逐年上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

1987 年 12 月 24 日，武汉至香港包机首航成功。1991 年 10 月，民航广州管理局将 5 架波音 737-200 型飞机调入湖北民航局，运力规模进一步扩大。武汉公用航空不仅结束了经营活塞式涡桨小型飞机的历史，也为开辟国际航空创造了条件。1992 年 10 月 31 日，由南方航空湖北分公司承担的北京—昆明—万象的国际航班飞行任务圆满完成，开辟了第一条国际航线，标志着武汉公用航空走向国际。1998 年 7 月 17 日，南方航空开通武汉至福冈的首条始发国际航线，空中距离 1724 公里，飞行时间 2 小时 30 分钟，使用机型 B737-300 型，每周一、周五各飞一班，当日往返。

1978 年，武汉公共航空旅客吞吐量仅

6.5 万人次，1992 年突破 100 万人次，2006 年突破 500 万人次，2009 年突破 1000 万人次，2016 年突破 2000 万人次，2019 年达 2715 万人次。从 100 万人次到 500 万人次用了 14 年，从 500 万人次到 1000 万人次仅用 3 年，从 1000 万到 2000 万只用了 7 年。

2024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 时 25 分，随着南航 CZ6606 北京—武汉航班缓缓滑入停机位，率先走出机舱的武汉籍旅客黄先生成为天河机场迎送的第 3000 万名旅客，标志着武汉成为继上海、北京、成都、杭州、西安、广州、深圳、重庆、昆明之后，中部地区首个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3000 万人次的城市。

参考文献：

- [1] 《申报年鉴》，申报馆特种发行部，1934 年。
- [2] 《武汉老新闻》，武汉出版社，2002 年。
- [3] 《中国民航机型大全》，中国民航出版社，2015 年。
- [4] 刘亚洲，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第 2 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一张欢送苏联专家的老照片

◇ 陈礼才

最近，我收到一张“武汉汽车制造厂与苏联专家贝林卡同志合影”的老照片，勾起我对武汉汽车配件厂一些往事的回忆。“武汉汽车制造厂”和“武汉汽车配件厂”两个厂名之间的转换，寄托过汽配人的“汽车梦”。

这张老照片，为1960年春节前欢送苏联专家回国休假而合影留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照片中的人物，有助于获取一些历史信息，也可为研究者留存一些线索。

第一排正中是苏联专家贝林卡，穿西装打领带，年纪50开外。

第一排左一已不记得名字，只知原为省委某部门领导，1959年因“反右倾”下放来任

副厂长，没多久就调走了，他的儿子在工具车间当工人。左二杨进贤（行政13级），原为第二汽车厂筹备处（在武汉硚口区荣华村）领导。筹备处撤销后，他调入任厂党委书记，部分干部也一同调入，筹备处的房产、



办公用品等也全部划了过来。左四白洛（行政 12 级），曾任新四军五师侦察科科长，1953 年从中南局调入任厂长。左五南下干部宋连祥，党委副书记。

第二排左一潘重远，总工程师，国家 5 级工程师，他的工资全厂最高。左二尹定祥，生产车间负责人。左三欧锦昌，青年技术员。左四钱长松，生产车间负责人。

第三排左一乐云，生产副厂长。左三肖诗文，计划科科长。左二和左四认不出来。

照片中所认识的人，遗憾的是都已去世，无法了解更丰富、更详细的情况，但他们的音容相貌历历在目。

1953 年，我国全面学习苏联，在工业系统推行“一长制”领导制度。苏联分期分批派专家为中国各重点企业，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厂来过几批苏联专家，为此专门设立“苏联专家办公室”负责接待、协调和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等工作。苏联专家与我们的合作很友好，我们虚心学习苏联也是十分认真的。

对于苏联专家的建议，当时能做到的立即落实，暂时做不到的列出整改计划并明确专人负责。苏联专家对我们厂的生产、技术现状，给予理解和尊重。我记得 1959 年春天，两位年青苏联专家来到我工作的中央试验室物理金相组，看到我们配备有东德的万能试验机和蔡司大型金相显微镜、美国的金相试样抛光机（1953 年经香港购得）等先进设备给予充分肯定，看到我们的金相分析报告后也十分赞赏：“稍作加工就是一篇论文。”

在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期间，广泛应用苏联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实行科学生产与管理。按产品原则设立车间和生产流水线，改变了过去按工艺原则设立的模式，便

于组织生产和提高效率。建立台账和统计、核算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和统计工作。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加强劳动保护。制订工时定额，有条件地实行计件工资制。制定材料定额，节约原材料，降低物耗。编制月度生产作业计划，强化生产调度工作。每季度进行一次经济活动分析，及时改进工作，确保年度计划的实现。

1956 年，我们厂成功将需要进行热处理定型的正圆活塞环改为椭圆环，缩短了工期，提高了效率，并以铬钼合金取代战略物资镍铸造活塞环。1960 年初，又率先用粉末冶金工艺取代离心浇铸铜合金轴瓦。

我们厂一直在做“汽车梦”。1952 年造出新中国第一批吉普车，1957 年成功试制出红旗牌旅行车（仿英国 Land Rover），1958 年又造出一批 1.5 吨农用车。随后，在武昌沙湖边征得一块地，招收 4000 多名新工人，边培训边劳动建新厂，奠基典礼由《长江日报》大篇幅报道，“武汉汽车配件厂”也正式改名为“武汉汽车制造厂”。

为了求得中央的支持，厂长白洛亲自带队上北京，向老首长李先念副总理提交上汽车项目的报告。后因遭遇三年特殊困难及苏联专家撤走，“武汉汽车制造厂”未能被列入国家计划而下马，1962 年又重新改回“武汉汽车配件厂”。

这一张 1960 年的老照片，多少反映了那一阶段的历史变迁。

陈礼才，曾任武汉汽车配件厂党委书记、湖北汽车集团党委副书记，现年 89 岁